

# 全球對話

13.3

##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 與 Rita Segato 談社會學

Breno Bringel  
Vitória Gonzalez

### 熠熠生輝的 ISA

Margaret Archer  
Michel Wieviorka  
Michael Burawoy  
Margaret Abraham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Martin Albrow

### 批判理論視角中的世界 (反之亦然)

Stephan Lessenich  
Gurminder K. Bhambra  
Manuela Boatcă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iguez  
Bruna de la Torre de C. Lima  
Esteban Torres

### 減碳化與綠色殖民主義

Breno Bringel  
Maristella Svampa  
Hamza Hamouchène  
Nnimmo Bassey  
South-South Manifes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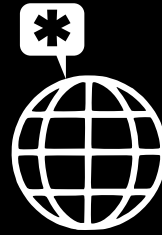
### 理論觀點

Kathya Araujo

### 議題開講

- > 「恐懼政治」與威權政治想像
- > 以水運動抗爭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isa**

第13卷 / 第3期 / 2023.12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GD



## > 主編的話

**在**本期的第一篇文章中，我們訪談了知名學者／運動者 Rita Segato。訪談過程裡，我們談到了他在性別、暴力、殖民主義等領域的貢獻，也討論到如何將南方的南方以及全球的視野與前述議題結合。Segato 也分享他對當代議題的觀點，例如威權主義的挫敗以及女性主義運動的國際化。

Izabela Barlinska 擔任本會的執行秘書40年，期間有許多貢獻，如今終於退休。於是ISA本期有幸能新增一個專欄，其中收錄了五位前主席 (Margaret Archer、Michel Wieviorka、Michael Burawoy、Margaret Abraham、Sari Hanafi) 以及剛於 Melbourne 上任的現任主席 (Geoffrey Pleyers)，對 Barlinska 致上的敬意。在這份專欄中，我們也將刊出 Pleyers 在第二十屆世界社會學大會的就職演講。悲傷的消息是，Margaret Archer 剛剛辭世，Martin Albrow 也在專欄中向其致意。

除此之外，本刊還有另外兩個專題。首先，是由 Stephan Lessenich 和 Estaban Torres 組織的「批判理論視角中的世界 (反之亦然)」，時逢社會學研所 (IfS) 成立一百週年，他們將在專題中總結當前的批判理論。在這六篇文章當中，作者們從不同觀點重新檢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包含：它與全球社會學的關係 (Stephan Lessenich)、後殖民主義 (Gurminder K. Bhambra)、去殖民主義批判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邊緣經驗的全球化 (Manuela Boatcă)、文化產業 (Bruna de 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以及提倡世界社會的新批判理論 (Esteban Torres)。

社會現象背後，是存在著全球交織性的。在「減碳與綠色殖民主義」此一專題中，作者們也秉持著這樣的觀點，探討霸權生態主義轉型對於全球南方的

影響。Bringel 和 Svampa 認為，一種以氣候和環境問題為中心的新資本主義共識正在成形，他們將其稱為「減碳共識」。運動家 Hamza Hamouchène 和 Nnimmo Bassey 則分別從北非和泛非的角度，分析全球北方能源轉型所派生的綠色殖民主義。最後，我們也將刊出由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的運動家、知識分子及組織共同撰寫的《正義與大眾生態社會轉型——南方的南方宣言》。

「理論對話」中，智利社會學家 Kathya Araujo 呼籲，有必要重新審視威權 (與威權主義) 理論。他回顧了一些較為經典的理論模型，指出他們如何因社會變遷而過時，並以互動與關係性方法為基礎，提出一些分析威權的可能途徑。

受 Araujo 的啟發，Lara Sartorio 於「議題開講」的首篇文章中，探討恐懼政治如何為主體性構框，並形塑了威權政治的想像。除此之外，Madelaine Moore 則介紹《Water struggles as resistance to neoliberal capitalism》中的幾項重要發現，透過水的政治與社會再生產理論進行對話。

至今，新的《全球對話》編輯團隊已經運作了一年，我們期待未來能構持續在不同的讀者、文化、地方和知識傳統之間建立橋樑。未來一年，將會有更多值得期待。別忘了，如果你喜歡這份刊物，也可以用你的母語協助我們推廣。■

Breno Bringel, 《全球對話》編輯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官網](#)。

> 投稿來信寄至：[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mailto: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s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 編輯團隊

主編: Breno Bringel.

助理編輯: Vitória Gonzalez, Carolina Vestena.

副主編: Christopher Evans.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 Michael Burawoy, 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顧問編輯: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ó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世界: (黎巴嫩) Sari Hanafi, (突尼西亞) Fatima Radhouani.

阿根廷: 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Dante Marchisio.

孟加拉: 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Abdur Rashid, Abu Ibrahim Huda, Mohammed Jahirul Islam, Sarker Sohel Rana, Eashrat Jahan Eyemoon, Helal Uddin, Yasmin Sultana, Saleh Al Mamun, Ekramul Kabir Rana, Farheen Akter Bhuiyan, Khadiza Khatun, Aysha Siddique Humaira, Arifur Rahaman, Istiaq Nur Muhit, Md. Shahin Aktar, Suraiya Akhter, Alamgir Kabir, Taslima Nasrin.

巴西: Fabrício Maciel, Andreza Galli,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Ricardo Nóbrega.

法國/西班牙: Lola Busuttil.

印度: Rashmi Jain, Manish Yadav, Rakesh Rana.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Elham Shushtarizade.

哈薩克: 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波蘭: Aleksandra Biernacka, Anna Turner, Joanna Bednarek, Marta Błaszczczyńska, Urszula Jarecka.

羅馬尼亞: 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George Bonea, Marina Dafta, Costin-Lucian Gheorghe, Alin Ionescu, Karina Ludu, Diana Moga, Ramona-Cătălina Năstase, Bianca Pințoiu-Mihăil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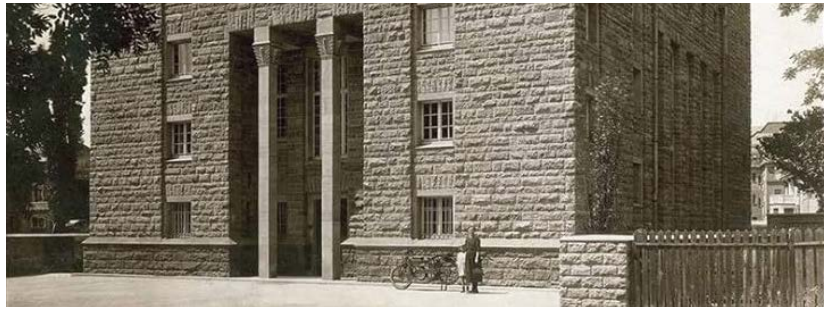
俄羅斯: Elena Zdravomyslova, Daria Kholodova.

臺灣: 李宛儒, 呂道詠, 黃翊碩, 簡芊樞, 賴奕璋, 林韻柔, 周芸瑄.

土耳其: 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Rita Segato, 來自阿根廷的作家、人類學家、女性主義者, 關注殖民性等重要議題, 並致力於使全球南方的聲音被聽見。



社會研究所 (ISR) 迎來成立的第一百週年, 法蘭克福學已有百年歷史, 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歷史和當代批判理論的機會。



如今, 生態社會轉型已經是成為政治經濟議程的核心焦點之一, 因此, 我們不能單單將其化約為能源轉型或抵抗全球南北不平等。

封面圖片來源: iStock, 2021。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 目錄

主編的話 2

### > 社會學對話

超越少數族群化與殖民化：Rita Segato 專訪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Vitória Gonzalez, 巴西 5

### > 熠熠生輝的 ISA

為ISA奉獻的四十年：向 Izabela Barlinska 致意  
Margaret Archer, 英國, Michel Wieviorka, 法國, Michael Burawoy 和 Margaret Abraham, 美國, Sari Hanafi, 黎巴嫩,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時 8

全球社會學的四個轉變  
Geoffrey Pleyers, 比利時 12

向瑪格麗特阿切爾(1943-2023)致上個人敬意  
Martin Albrow, 英國 15

### > 批判理論視角中的世界(反之亦然)

批判理論和全球社會學：姐妹同盟？  
Stephan Lessenich, 德國 16

棉花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後殖民反思  
Gurminder K. Bhambra, 英國 18

邊緣逆寫：殖民經驗的世界化  
Manuela Boatcă, 德國 20

整體性與外部性：去殖民批判理論的範疇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 美國 22

文化工業：批判理論的(政治)研究議程  
Bruna Del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 德國／巴西 24

邁向全球社會的批判理論  
Esteban Torres, 阿根廷 26

### > 減碳化與綠色殖民主義

減碳共識  
Breno Bringel, 巴西／西班牙, 以及 Maristella Svampa, 阿根廷 28

北非的能源轉型：殖民主義、剝奪與徵用  
Hamza Hamouchène, 英國／阿爾及利亞 32

非洲的綠色與內部殖民主義  
Nnimmo Bassey, 奈及利亞 35

南南合作：促進生態社會能源轉型之宣言  
多位作者共同撰寫 38

### > 理論觀點

革新威權(與威權主義)理論的必要  
Kathya Araujo, 智利 41

### > 議題開講

「恐懼政治」與威權政治想像  
Lara Sartorio Gonçalves, 巴西 44

以水運動抗爭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  
Madelaine Moore, 德國 47

「全球社會學不該繼續以西方大學為中心，也不該以那些自詡為適用於世界各地的概念為尊，並要跳脫這類對這種西方社會學的批判」

Geoffrey Pleyers

# > 超越少數族群化與殖民化： Rita Segato 專訪



來源: Beto Monteiro / Secom UnB

**Rita Segato** 是一位享譽盛名的阿根廷作家、人類學家和女性主義運動家。她是巴西利亞大學的名譽教授，近年來獲得了將近十所歐洲、拉丁美洲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以及數個重要獎項，包括：加勒比哲學協會頒發的 Frantz Fanon 獎（2021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議會頒發的文化傑出人物獎（2019年）等。此外，她還分別在聖馬丁國立大學以及馬德里的索菲亞王后博物館，開設「不安定思想」Rita Segato 講座以及 Aníbal Quijano 講座。除了擁有傑出的學術生涯，在種族、民族、國家、宗教、性別、暴力和殖民多個領域皆有創新研究外，她也在人權領域有巨大貢獻。例如，她是巴西第一個為了確保黑人和原住民學生能進

入高等教育，而和他人合作推出著作的人（1999年）；還和拉丁美洲的各種婦女組織合作，是婦女運動的重要人物。她最近以英語出版《[The Critique of Coloniality](#)》（Routledge, 2022）。2023年9月，Rita Segato 接受了全球對話編輯 **Breno Bringel** 和 **Vitória Gonzalez** 的採訪邀約。

Breno Bringel 和 Vitória Gonzalez(BB&VG): 近年來,您的成就與學術生涯,已經在全世界受到肯定。然而,我們認為,來自世界各地如非洲、亞洲、中東甚至歐洲地區的讀者,仍然需要進一步了解您的研究。您的研究貢獻,以關注拉丁美洲居多,您認為這些貢獻,與其他脈絡的社會或現象如何關聯?這些如何有助於推動以全球南方出發點的全球對話?

Rita Segato(RS):不幸的是,傳播思想的主要樞紐仍然是美國。關於「什麼事情值得關注?」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大程度都是經過了美國的過濾。學術界大多數人,都是透過這個經過全球北方篩選的視角,來決定什麼著作比較值得閱讀。簡單來說,所有事物的驗證過程都在那裡完成,這本來就是帝國的任務之一。另一方面,關於思想傳播這個主題,於全球南方已經有許多討論。雖然有點抱歉,但我必須說,我是不相信自我限制這個說法的。我更傾向同意秘魯思想家 Aníbal Quijano 的觀點,他說,儘管來自南方,但他不只是在思考南方,也不只是為南方思考,而是為了世界思考。世界仍處於殖民結構當中,而思考並試圖消解這種結構,也是一個涉及全球的問題。

至於我的學術工作,我希望能夠和更多非洲、加勒比、亞洲和中東研究當代議題的學者見面。雖然我們尚未充分利用虛擬現實,其效果仍無法媲美實體的經驗,不過這至少為實現這件事開啟了一扇大門。不過,即使我們打算與前殖民地學者進行對話,我們還是得提醒自己,我們是為了這個世界,而進行思考和書寫。你可以在我的少數化(minoritisation)批判著作中看到此觀點。少數化指的,是由多元文化主義賦予「他者」(即具有完整主體性的任何本體,如女性、印第安人、黑人、不同性向的族群等)一個定義。

在我看來,我們必須破除這種對於政治少數的定義,即他們的行動與思考都是以自己為出發點。如果女性在倡議中取得了進展,那麼當父權體制崩潰時,所有的權力結構也都將被動搖,而我們的對手非常清楚這點。這些倡議可能帶來的潛在威脅,讓他們試圖走上街頭抗議,並重複著毫無意義的口號,例如「性別」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不是一個能夠解釋性別的文化建構與多樣性的分析工具。這些人出現在街頭上,就證明了被低估的「少數群體」對於世界的既有結構帶來了多大程度的威脅。

BB & VG:如果我們可以協助您將一篇作品翻譯成我們刊物所涵蓋的各國語言,您會推薦哪一篇?為什麼?

RS: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對作者來說很難回答。我的一些文章探討了父權壓迫,另一些涉及種族壓迫,

還有些探討了「政治」和「政治性」的差異(主要是在批判政治受到國家掌控)。現在很多文章都以訪談和甚至是影片的形式傳播。我越來越多用說話的方式來表達,寫作則是越來越少了。這一方面是因為年紀大了,一方面是我更迫切地想被理解。

雖然這樣說,不過,我的倒數第二本書裏面有兩篇比較不知名的文章:〈重建女性主義以重建政治〉和〈沒有一個父權老闆會發動革命:資本主義和父權的關係〉。這本書於2022年以葡萄牙文出版,叫《Cenas de um pensamento incômodo》,2023年則以西班牙文出版。我最新出版的著作的前言〈讚美不確定性〉言簡意賅,很好地表達了我的觀點。這本書於智利以西班牙文出版,名為《Expuesta a la muerte》。

還有一本書裏面,有我後續思想的所有基礎概念。雖然近年來有些作品已經或正在被翻譯成英文、德文、法文、義大利文、葡萄牙文,甚至希臘文,但這本書並沒有這麼幸運。他叫做《Las estructuras elementales de la violencia》,其中的關鍵章節〈性別結構與強暴授權〉,是我後續所有思想的基礎。

關於前面提到的多元文化主義批判,在我的書《La Nación y sus Otros》中,有幾章特別在講這件事情,尤其是章節〈政治身份/歷史他者:批判全球多元主義的確定性〉。同樣在那本書中,我預測了某種「政治」批評的出現,由於封閉於相似性質的網絡中,其具有向心性、內向性、內生性、領域性。

BB & VG:您在過去的作品中,開創了許多有趣的、探索性別與殖民關係的方法。如今全球極右主義崛起,使得種族主義、殖民主義和性別暴力加劇,我們該如何應對這樣的歷史機制?

RS:第一個問題,是思考種族主義、父權與殖民之間的關聯。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當代法西斯主義的形成。法西斯主義意識形態的關鍵策略、方法或說結構,就是會將某些「他者」建構為敵人。法西斯主義需要藉由塑造一個敵人、一個為其犧牲的受害者或代罪羔羊,來凝聚其權力及盟友。可以說,法西斯主義是藉由「他者」的建構而形成的。因此,受到種族歧視的人、女性和性別異常者,特別容易成為「他者」的對象。形塑「社會的共同敵人」並不困難,「他者」在過去殖民結構的遺緒之下,早就已經被視為威脅。

BB & VG:多年以來,我們都認為像是阿根廷這樣,經歷了較多歷史事件與人權運動的國家,可能會對於威權主義更有抗性。然而如今,我們也能在阿根廷看到一股修正主義的潮流,甚至是否認主義。你如何看待這樣的情況?

&gt;&gt;

RS: 我們至少得將阿根廷政治生活的兩個層面納入考量。首先, 國家管理之於被管理的對象間的外部性: 自國家建立以來, 阿根廷的領土和人民, 都處在這種狀態當中; 我將這種狀態稱為「根基錯誤」, 其確保管理的殖民性能夠持續存在。其次, 是「政治」(politics) 與「政治性」(the political) 之間的距離。前者源自於國家結構的行動與決策、政黨組織化的社會運動、其中的派系和利益, 以及它們典型的內生行動導向; 後者指的則是在社會中流動、編織社會關係, 並有效地引導歷史。

阿根廷的右派選民, 追求的是在社會部門的引領下將政治「重啟」, 並基於過去的歷史, 主張領導者需要更公平地分配資源, 且認為政治只應該活躍於政黨內部; 他們放棄了人民該持有的角色, 並將其視為需要被帶領的群體。這種缺乏(或說被剝奪了)主動意識的情況催生了(尤其是)年輕人的恨意。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信念, 是「如果不生活於在媒體的聚光燈之下, 你的生活就不夠充實; 你就不存在」。在民主和現代性承諾從未被實現的情境下, 恨意只得不斷地累積。

民主並非只是關於民主。現代性——平等, 有愛, 自由——也並不只是關於現代。這些累積的怨恨和失望情緒, 被反民主的政治勢力所利用。導致阿根廷種族滅絕的人已經走進了正義與審判當中, 然而藉此實現的「權利」如今似乎也遙不可及。現在, 這只是國家當局的業務, 而大多數人並不願參與其中, 也不感覺自己在其中有所歸屬。

BB & VG: 現在還有所謂的女性主義國際嗎?

RS: 國際的概念其實是很有趣的, 這指向的是一個跨越國界、社群、具有相同目標與抱負的女性主義。不過, 這種女性主義的潛在風險, 是我剛剛所提及的, 「人民」與「政治」之間的距離。由「專家」和保有傳統觀念的人組成的高峰會議, 可能會危害女性主義運動。女性主義運動應該是多元, 且以創造沒有霸權的世界為目標的。由於歐洲中心的女性主義仍保有垂直主義, 非洲部分的女性主義運動者, 選擇使用「婦女主義」(womanism) 來指稱自身。兩者背後有著不同的歷史, 以及各自獨特的性別結構脈絡, 由這些差異而生的抗爭和其目標也有所不同。唯有從這些差異之中, 找到兩者共有的追求時, 女性主義國際才有意義。

BB & VG: 讓我們最後再快速地問個問題: 你認為我們洲的原住民,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全球社會學可以學習的?

RS: 準確來說, 是那種不會在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產生隔閡、能夠保有對於多元世界的想像, 而不將自然和身體客體化的政治理念。這樣的理念充滿生息, 且以人與人之間的連結為本; 和以物為本的理念相比, 兩者對於幸福想像極為不同。■

# > 為ISA奉獻的四十年： 向 Izabela Barlinska 致意

前ISA會長 Margaret Archer、Michel Wieviorka、Michael Burawoy、Margaret Abraham、Sari Hanafi，以及ISA現任會長 Geoffrey Pleyers



Izabela Barlinska 在2023年墨爾本國際社會學協會第二十屆世界社會學大會上致詞。

Margaret Archer (於1986-1990年間擔任ISA會長) \*

四十多年前，ISA執行委員會會議於波蘭召開，那是我第一次見到 Izabela，她莊重地站在紛飛的雪花中迎接我們。我當時以為，這位身為 Magdalena Sokołowska 姪女的博士生，只是來幫我們安排當地的一些行政事宜，殊不知我錯得離譜。出現此地的她，並不是寫論文寫到一半、對 Virginia Woolf 這個主題感到厭煩了，才跑來休假一週，而是就此加入ISA，並持續為其辛勞了四十年。我們立刻就打成一片了，畢竟我擁有一張英語文學學位。不過，確實有幾年，我經常在想，鼓勵她離開波蘭、加入四處奔波的ISA，究竟是不是個好主意。

在成為ISA會長之前也曾經擔任過執行秘書的 Tom Bottomore，對此倒是完全沒有後悔過。秘書處還設在布魯塞爾時，他就已經發現 Izabela 擁有很強的行政和組織才能。作為當時少數不認為專業能力會受性別影響的男人，他成為了 Izabela 一生的支持者、摯友。我們兩人，都因為他的「啟蒙」而受益。當然，待在布魯塞爾並不是長久之計，最終，秘書處預計於1987年遷往西班牙。不過，這項計畫也遇上了一些困難——當地一間新成立的研究中心，同樣要求ISA在馬德里為其提供一處辦公空間，而這和為秘書處在西班牙設立新據點的計畫，產生了一點摩擦。我還記得幾場談判中的一些場景裡面，出現過一張真的很大的桌子，也記得ISA向教育部提出抗議。

>>



我提到的「秘書處」，在1987年，指的其實就只是 Izabela 一個人而已。當時的她只是個西班牙語初學者，雖然社交能力很強，但在馬德里沒認識幾個人，需要和房屋市場打交道時，也只能仰賴自己的常識。她快速地取得了當地專業組織的協助，解決了居住問題、於工作上展現了自身能力，短時間內就精通了西班牙文，並找到了屋頂的一間公寓。這一切都讓我很難相信，我最後一次來到這裡，就是和她一起看著夕陽、共享了一瓶酒的那次。

因為執行委員會會議每年都辦在不同地區，Izabela 和我踏遍了世界各地，在全球化這個詞出現之前，我們早就全球化了。我成為會長後，和她的合作關係更為緊密，也是這時候，我才意識到她需要負責的業務範圍有多麼龐大。從創辦新期刊《國際社會學》、將西班牙文納入為第三

個官方語言、處理激增的研究委員會帶來的行政庶務，再到歡迎國王和王后參加世界大會(1990)等等，這些任務都與她有關，但她卻毫不費力地將這些工作一一完成。

後來，Izabela開始嘗試完成她早年的目標：取得博士學位。這次，論文主題是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後來以西班牙語、波蘭語出版。這幾年，我們一直保持著聯絡，我們通常會一起到某個地方度假一週(Céline Saint-Pierre也常常一起來)。我成為潘普洛納納瓦拉大學客座教授之後，我也有幸經常拜訪馬德里，和她共度幾天時光——買靠枕、逛藝術博物館、在她家的屋頂花園再開一瓶酒。沒有 Izabela，就沒有現在的ISA，她過去的付出，影響了如今ISA的每一位成員，包含那些無緣遇見她的人。願她回到波蘭後，能感覺回到了自己的歸屬之地。■

*\* 此文是 Margaret Archer 在2023年4月2日，也就是她去世(詳見編輯的話)的一個月之前所寫。*

#### Michel Wieviorka(於2006-2010年間擔任ISA會長)

ISA... IZABELA..... 這麼說也沒錯，有 IZAbela 在的ISA，確實很「Bella」(法語中指帶有魅力、美好的)。自1982年(墨西哥!)以來，我就加入了ISA；在擔任會長期間，我也和她有過許多一起合作的經驗。要我說的話，我認為，要是沒有她在，這個組織肯定不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他的工作效率難以置信的高，而且待人非常友善。她清楚地知道我們的生活是以知識與

科學為核心、理解這樣的生活如何運作，行政能力也很出色。她是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人，而且——從波蘭的政治與社會生活，所涵蓋的那些美好特質來說——很波蘭。她總在必要，或能帶來幫助的時機出現，但不會做過頭。她了解一切、理解我們，但不會過度地干涉。容我以法語補充：Izabela 不僅是ISA的批判行動者，她也是一個優雅的人，具有「la classe」，且是「grande classe」。願她在新的旅途中一切順利。■

#### Michael Burawoy(於2010-2014年間擔任ISA會長)

Izabela Barlinska 致力於發展ISA，也為國際社會學與近來的全球社會學貢獻良多。另一位對此有許多貢獻的 Margaret Archer 於近日辭世，也讓人十分難過，兩人在ISA於馬德里成立的關鍵時期，協助彼此完成了許多任務。歷任會長中，她是跟 Izabela 最親近的。她對

Izabela 的致意，可能是她最後寫下的文字之一。

Margaret Archer 向我們講述了 Izabela 如何被她的阿姨招募，並於1977年接待了前來華沙的執行委員會。那是在團結工會運動發生的四年之前，Izabela 還是一名學生的時

候。1981年12月戒嚴令發佈，團結工會的地下領導人，鼓勵 Izabela 接下ISA的邀請。他認為，Izabela 可以在西歐，成為波蘭反對派與流亡者之間的重要紐帶。需要澄清的是，Izabela 並沒有逃離祖國，也沒有到西方尋求庇護。應該說，她根本沒想過要不要這樣做。她是波蘭的忠實公民，一生盡其所能地為波蘭的民主力量提供支持。從這個角度來說，Izabela 的一生，與今年大會的主題反威權政治，其實也挺切合的。

雖說 Izabela 一直不喜歡炫耀自己的知識和專業，但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記得，她作為社會學家的貢獻。領導ISA期間，她在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撰寫了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 Víctor Pérez-Díaz。這篇論文叫做《[波蘭民間社會與團結工會](#)》，以西班牙文出版，並以波蘭團結工會和戒嚴法下的日常生活為研究對象、關注反對國家與黨派結合的勢力如何變遷。這篇作品呈現了蘇聯終結如何開始，不過她撰寫論文的當下，也還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結果。這也提醒了我們，反威權的抗爭，可能不會在短時間內成功，但其能夠帶來的影響，卻也非常巨大。

似乎偏題了——讓我們回到正題，來談談 Izabela 對ISA的貢獻。我同意 Margaret Abraham 和 Michel Wieviorka 的觀點：Izabela 一直是ISA的重要支柱。我們不要忘記，她1977年開始和ISA合作時，整個組織的成員還不到1000人。1987年，她擔任執行秘書時，會員人數還不到2000。到了疫情來襲之前，會員人數已經超過了5000。研究委員會、國家協會的會員數量，隨著會議的出席人數增加而有了大幅

成長。一年兩次的論壇，也是在她的領導下引入。這四十年間，Izabela 在她康普斯頓大學的小小辦公室中，率領ISA走過了一次次重大變遷。她和兼職成員 Nacho、Juan 和 Lola，一同維繫了整個組織的運作。我們必須記得，美國社會學協會現在的會員，只比ISA多了一倍，卻有23個全職員工！直接點說：ISA的財務健康，是有賴於 Izabela Barlinska 的無限能量、奉獻精神與組織才能。

她之所以能在擔任執行秘書期間，和這個令人畏懼的、爭議不斷的「小型聯合國」談判，正是因為她有意識地不主動接觸ISA的政治事務。在執行委員會會議中，即便受到強烈的挑性，她也無動於衷。她的目標一直以來，都是為ISA的運作提供支持，以及促進重要的創新，例如：沃勒斯坦的區域研討會、馬丁內利的博士實驗室、阿切爾的新期刊《國際社會學》。

執行委員會負責做出決策，而 Izabela 則盡其所能地完成這些任務。她從來不會主動推卸責任。我還記得德本ISA會議的時候，她一直在處理為登記而排隊的人潮，甚至為此超時工作。她總是在ISA會議的最前線，正如會議之間，她也總是維持著ISA的運作。無論危機發生在世界哪一處的會議現場，不管是我們的據點被強行關閉、大會或論壇場地出問題，還是監督ISA的預算，她都處理得非常完善。和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國際組織相比，ISA擁有一段悠久而繁榮的歷史——我們都欠 Izabela 一個大人情。祝她回到波蘭後開啟的新事業一切順利。■

Margaret Abraham (於2014-2018年間擔任ISA會長)

**能**夠認識 Izabela Barlinska 博士三十多年，並與之密切合作，絕對是我三生有幸。Izabela，您在危機中總能保持冷靜、精通多種外語、擁有極強的制度記憶，且關注ISA各方面的工作，這些特質極為珍貴。在擔任ISA副研究長，以及ISA會長時，我和您有許多合作，我認為正是您的大力支持，促成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第二屆ISA論壇，以及多倫多的第九屆ISA世界大會。如果沒有您和您團隊的付出、能

力、專業與合作，我們不可能完成這些。身為一名女性主義者，我很慶幸ISA秘書處是由有這樣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專業的社會學家領導，她卓越的見識與務實精神，為全球社會學界貢獻良多，並使得ISA的薪火得以延續。ISA是個優秀的組織，而我很高興您曾一直在這段旅程中陪伴著我們。我向您致敬，並衷心希望您能感受到我充滿謝意的擁抱。■

Sari Hanafi (於2018-2023年間擔任ISA會長)

**看**完前面的這些文字，我覺得自己已經沒有什麼好補充的了。不過，和前面這些歷屆會長不同的是，比起他們，我在生涯的很早期就認識 Izabela Barlinska了。那時我還在讀博，也是1990年Bielefeld大會青年社會學家世界競賽的獲獎者之一。她不厭其煩地回答了我的許多問題，如此的親切讓我印象深刻。其中一些問題其實很笨，畢竟那是我第一次參加大型會議。

自那時起，我一直與和她保持著聯絡，包含擔任執行委員會成員、國家協會副會長，以及最近擔任ISA會長的時候。每當我需要時，她從不吝於給我一些充滿智慧的建議。必須說，即便我有時候不會聽從這些建議，但她從來不會因此生氣，真的很厲害。總之，我不記得 Izabela 有在任何情況下，表露出過度憤怒的情緒。即使是特別激烈的討論，她也會在冷靜思考後回應。我很羨慕她的冷靜。

我經常在會議之外的場合和她交談。我們很少聊同事的閒話，反而比較常討論黎巴嫩、巴勒斯坦、波蘭、社會學、藝術、文學等話題。身為一個具有國際視野的人，她擁有豐富的大眾文化知識。疫情時期，我們經常與副會長、執行委員會和其他委員會開線上會議。她通常不會在Doodle的投票裡面表達自己的選擇，因為她總是希望能找到對大多數與會者來說最佳的開會時間。有時候，我也會因此有點尷尬，因為這些最佳時間，常常是清晨或深夜。

Izabela熟知ISA的歷史，所以她知道什麼做法更容易奏效，也知道社會學家社群會對ISA執行委員會的決策，作出怎樣的反應。Izabela，我們之前說過，打算有一天一起去爬山。為了維繫我們在ISA之外的友情，我現在更想要去爬山了。謝謝你，Izabela，謝謝你在過去的40年中，為ISA所做的一切。ISA真的欠你很多.....。■

Geoffrey Pleyers (於2023-2027年間擔任ISA會長)

**前**述文章中，ISA的歷任會長已經呈現了 Izabela Barlinska 過去四十年間如何參與ISA的歷史，並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作為ISA副研究長，我有幸見證她的付出，包含最近的轉型準備、培訓新執行秘書等等。她抱持著對ISA的熱愛，以特有的謹慎高效地完成了這些任務。藉此，她也透過具體實踐，為我們上了一課。她提醒我們，ISA比任何人都重要，且值得我們如此付出。希望我們組織，甚至世界上所有的組織領導者，都能有這樣的精神，並願意用智慧、貢獻與對組織的熱情，盡心盡力地培養後人。

Izabela Barlinska 對ISA的影響無人能及。對成千上萬的社會學家來說，她就是ISA的代言人與門面；任何質疑研究委員會或是執行委員會的人，都可以看看她的所作所為。如今，我們從她手中承接了這個極為優秀的，曾在各大洲捍衛、發展社會學的組織。我們一定要維持同樣的標準，繼續發展下去。ISA是屬於她的，這四十年來ISA一直是她的歸屬，今後也將是如此。我們會確保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間，ISA當中仍然能保有專屬於她的位置。我們都希望能再在ISA的論壇、活動中再次見到她。■

想要知道更多關於 Izabela Barlinska 的事情，可以參考2012年《全球對話》中發布的專訪，由 Michael Burawoy 擔任訪談人，文章分為兩部分：[Part I](#) & [Part II](#)。

# > 全球社會學的四個轉變

Geoffrey Pleyers, 國家科學研究基金會,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Belgium, ISA會長(2023-2027)



| 圖片來自 Freepik 的 macrovector image。

會長上任, 第二十屆世界社會學大會, 墨爾本, 2023年7月1日

**雖**說社會學的目標, 就是要理解世界如何轉變; 不過這個學科本身, 也會受這些轉變影響, 而全球社會學又更是如此。由於這個世界在過去幾十年間經歷了許多變遷, 我們需要重新檢視全球社會學。我從1990年代末, 就開始研究全球化了。當時, 全球化已經是社會學的熱門主題之一。舉例來說, ISA在1990年舉辦的世界大會, 主題就是「一個世界的社會學」。三十三年後的今天, 這個世界變得更「全球化」, 其面臨的挑戰也更加嚴峻; 此外, 人們理解看待世界、全球化和社會學的方式, 也有劇烈的變化。在這篇短文中, 我將提到四個轉變分別為何、為什麼要改革全球社會學, 以及這四個轉變對ISA來說代表著什麼。

## > 溝通與聯絡的新工具

自1990年代以來, 最引人注目的變化之一, 是「新資訊與通訊技術」被大量使用。網路與虛擬世界在1990年代萌芽, 但連結性很快地被認為是加劇的全球化時代的基礎(Castells, 1996)。如今, 數位媒體和技術, 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生活中很重要的部分。它們徹底改變了我們溝通、接收訊息與共同生活的方式; 並對不管是民主、非自由還是極權政體下的公共空間, 造成了極大的改變。

數位通訊的技術, 也為ISA與全球社會學帶來了挑戰與機遇。數位通訊提供了讓世界各地的社會學

>>

分析被看見的機會，並讓人們得以接觸到更多的公民與政策制定者。ISA在疫情期間，組織了第一次的大型社會科學線上會議，有三千五百多名研究者參與。如今ISA的社群媒體，讓我們的社群每天能夠充滿活力。線上會議也讓人們有更多動力參與ISA，特別是研究理事會的線上會議。

### > 有限的地球

氣候災難與日益增長的生態意識，已極大地改變了全球化的意義與經驗。在1990年代，「全球化」指的是在冷戰結束後，西方市場模式與形式民主在重新統一的世界中無止盡地擴張。如今，隨著氣候崩潰與自然被破壞，全球社會學的核心有了新的形式。

「我們該如何在有限的地球上共同生活？」這可以說是社會學在21世紀必須解決的核心問題。生態與環境議題不僅僅是社會學的特定對象，它們與所有研究主題的對象與領域相交，成為社會學的核心問題。它們將改變我們的學科，改變我們對社會學與社會學者的期待。這將是ISA未來四年的核心主題。

### > 不是民主的擴張，而是威權主義的崛起

1990年代時，大多數知識分子、政策制定者和公民社會行動者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或至少有一個希望，亦即由網路帶來的全球化與增強的相互連結，將使得民主得以擴張，人們將更尊重人權。

在二十幾年後，我們為2023年世界大會所選擇的主題是「復興的威權主義」。不幸的是，這個由 Sari Hanafi 做出的選擇，很好並且很適當。阿拉伯之春爆發後，人們對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的熱忱在接下來的十年間逐漸消退。政府對自由的限制與專制的政權在各大洲逐漸壯大。他們學會了使用社群媒體與通訊技術有效地控制人民、干預其他國家的選舉，並向全球宣傳其敘事與政權模式。

社會學者與社會科學家對威脅到民主的專制政權、行動者、以及運動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也時常使社會學者受到威脅，與自由相關的研究在許多國家都會受到挑戰，無論是因為國家控制逐漸增強，或是由於學者會受到極右翼派人士與準軍事化軍隊的威脅。在這個時代，全球社會學需要特別關注並支持在進行研究時受到威脅的社會學者。在2016年一月二十五日，年輕的義大利社會學者，同時也是ISA研究委員會(RC47)的會員 Giulio Regeni，在開羅研究獨立工會時，被埃及警方逮捕、殺害。在2021年的論壇上，我們向Marielle Franco 致敬，他是一位社

會學者、地方政治家、以及反對國家暴力的行動者，其在2018年三月十四日，在里約熱內盧被幫派謀殺。在安卡拉監獄內寫出2021年ISA論壇上最有洞見的文章之一的卡爾頓大學博士生 Cihan Erdal，在伊斯坦堡做田野調查時被警方逮捕。

### > 全球南方的崛起

在1990年代，全球化與西化合二為一，將西方的市場經濟、文化、生活方式與世界觀向非西方國家傳播。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是指來自世界各地的行動者與國家的崛起。全球媒體關注著這些經濟與地緣政治行動者的崛起，這些行動者作為知識生產者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很少有學科像社會學一樣受到這種崛起的影響。不同大陸間的社會學家建立起了更深層的連結與對話，全球南方的學者所從事的開創性的工作被更廣泛地傳播，這個學科對於歷史與地理的新觀點，也轉變了「全球社會學」的意涵。在1990年代，全球社會學的文獻皆是由西方學者主導。全球南方和「東方」通常被視為西方概念的經驗研究場域。如今，全球社會學的核心在於，讓全球南方的學者與行動者的貢獻能夠被看見，並藉此挑戰歐洲中心的知識霸權。全球南方學者的理論、概念與分析能夠幫助我們理解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現在面臨的社會挑戰。這些改變了我們看待現代性、不平等與環境正義等重要概念的方式，也為我們展示了學科與自然、世界、以及我們自己之間，不同的連結方式。

去殖民、下層階級與後殖民的觀點與其批評者的宣稱相反，他們並未將認識論聚焦於抹去「西方社會學」的貢獻，並藉此開展「去殖民社會學」。就如同世界上任何地方所生產的知識，歐洲與北美的社會學應該定位於它的時間與地點，挑戰普遍主義的主張，並與全球南方的概念、世界觀與理論進行新的全球對話。

全球社會學既不能紮根於西方的大學與宣稱自身具有普遍性的原則，也不能侷限於對這種西方社會學的批判。

去殖民、後殖民與下層階級的觀點讓我們能夠去定位社會理論，讓我們與不同世界的現實與知識對話，藉此重新審視我們學科的關鍵概念。為不同大陸的研界者與方法間，開闢對話的空間，並促進全球南方與受壓迫少數民族的認識論與學者能夠與我們相融，這也是ISA成立的主要目的，這也是從1990年代以來，Immanuel Wallerstein 發展計畫的核心目的。

更全面地納入來自各大洲的社會學者、研究、分析與理論，不僅是為了社會學的民主化，也是為了提高我們對社會現實，以及對行動者的理解。因此，我們要做的不只是將更多來自全球南方的人納入ISA的成員當中，我們也需要鼓勵這些人積極地參與ISA、研究委員會、我們的活動與我們的計畫，並支持他們的國家協會。

### > 開放與關懷

全球社會學不只是一種理論研究的方法、或是一套認識論的辯論、或是對於方法論的挑戰。它也是社會學的、文化的、與個人的立場。

在去殖民化轉向後，全球社會學對於不同世界觀、文化與社會背景採取更開放的立場。這樣的嘗試立基於我們能夠接受自身可能將失去某些確定性，並試著從與他人的相遇中學習。它的根基與動力在於，我們承諾並且也樂於閱讀和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以開放的態度從不同的角度看待我們的研究對象，藉由不同的取徑理解他們，也許還能以不同的方式理解我們自己，以及我們在世上的位置。

無論是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具有洞見的研究與理論，在不同方法與分析間，以開放的態度進行對話，以及相互學習的意願，都是改版後的全球社會學的重要成分。

ISA的主要角色是建立起一個鼓勵跨文化對話的空間。在這個空間當中，我們可以在具有支持性的環境中分享我們的研究成果與觀點。想要實現這樣的企圖，我們需要的不僅只是意圖、論述與分析，還需要開放、寬容與互相關懷的實踐，特別是在國際化與多元文化的環境中。

讓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幾個月前，我參加了一個ISA博士實驗室，其中一名參與者是從巴勒斯坦經過漫長而緊張的旅程後，精疲力盡地來到這裡。在晚上用餐時，他因為在邊境時經歷了長時間的審問而恐慌發作。另外兩、三個參與者小心翼翼地將他帶到另一張桌子，聽他說話、支持他。一個年輕的博士生主動在附近的飯店訂了一間房間，照顧她並確保他當晚的安穩。隔天早上九點，他們兩人都回到了團隊參加開幕式，準備在未來一週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博士生與研究者進行深刻的學習與交流。這件事被處理地如此完善又周到，甚至當天晚上我都沒有注意到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具體的行動告訴我們，互相關心是發展全球社會學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雖然在大多時候這些是不會被看見的，但這種關懷和行動上的團結對ISA很重要。我舉的例子告訴了我們，ISA和全球社會學不只發生在我們舉辦的大型會議與代表大會上。ISA體現在不同文化間的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社會學者間的交流、對世界各地觀點與研究的開放，以及讓我們能夠在充滿支持的環境中分享它們的關懷的實踐，在一個威權主義、民族主義、不平等與環境崩潰日益加劇的時代，發展這樣立基於接納他人觀點與關懷實踐的全球社會學就顯得非常重要。

在第二十屆世界社會學大會即將結束之際，讓我們帶著這樣的關懷，在實踐中實現對全球對話的開放性與對彼此的關懷，讓我們共同建立一個新的、更加開放的全球社會學，從我們作為社會學者、研究者、教師、公民、以及人類，在我們所活躍的日常生活中開始。

我們這個世代所要面對的巨大挑戰是全球意識在逐漸形成，這讓我們能夠一同面對我們將面臨的挑戰，從全球暖化、環境危機、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與威權主義對民主的威脅等等。如果我們這些社會學者能夠勝任這項任務，社會學將有助於人們提高這種全球意識，並為解決本世界的一些挑戰中貢獻一份心力。■

來信寄至：

Geoffrey Pleyers

<[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mailto:Geoffrey.Pleyers@uclouvain.be)>

Twitter: [@GeoffreyPleyers](https://twitter.com/GeoffreyPleyers)

### Geoffrey Pleyers 的相關著作：

[Global Sociology as a Renewed Global Dialogue](#), Global Dialogue, 13.1, April 2023.

[For a global sociology of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methodological globalism and extractivism](#), Globalizations, 2023.

# > 向 Margaret Archer (1943-2023) 致上個人的敬意

Martin Albrow, 倫敦, 英國



來源: Manuel Castells Clemente / Universidad de Navarra

Maggie 離世的消息實在令人痛心!我們已相識許久,1966年因為彼此都擔任了英國雷丁大學新成立的社會學系的講師,而有了第一次的相遇。23歲那年她完成了倫敦經濟學院的博士學位,研究英國工人階級家長的教育期許和其對子女的影響;那時,大他五歲的我卻連碩士學位都還沒完成。或許是我被他震懾到了!所以決定離開那裡,留下他在接下來的七年獨自面對瘋狂的教授。縱使如此,他仍舊出版了14篇論文並去了華威大學,在那裡渡過了大部分的學術生涯。那段期間,我們始終保持聯絡。

他是一個出色的工作者,全然地專注於社會學,將它作為一門專業而非自己的工作去精進。我不想像其他人一樣只去讚揚他對這個領域的核心思想貢獻,我想特別致敬我們一起在ISA所做的努力。作為

當時 ISA 出版品委員會的主席,為了與主流期刊過份關注國內議題的狀況抗衡:這些期刊縱使表面上對全世界開放,但仍舊要求所有的投稿需要以英文撰寫,他主動找我一同創建《國際社會學》這本新的期刊。但我們魯莽地說我們可以安排任何語言的翻譯!而我們也做到了,特別是針對中文的翻譯。

我們的創刊號於1986年發行,前言由ISA主席 Fernando Cardoso 撰寫,那時他還不是巴西的總統!期刊中的六篇分別投稿自波蘭、印度、挪威、保加利亞和美國(兩篇)。任務達成!當時我們是這們想的,但為時過早,因為最初的期刊協議與我所在的卡地夫機構一同倒閉消失了。我們曾經歷了一段艱苦的談判期,直到Sage 加入,鞏固了期刊至今的名譽。Maggie 自始至終都是一個足智多謀且盡心盡力的人,完全有資格成為下一任ISA的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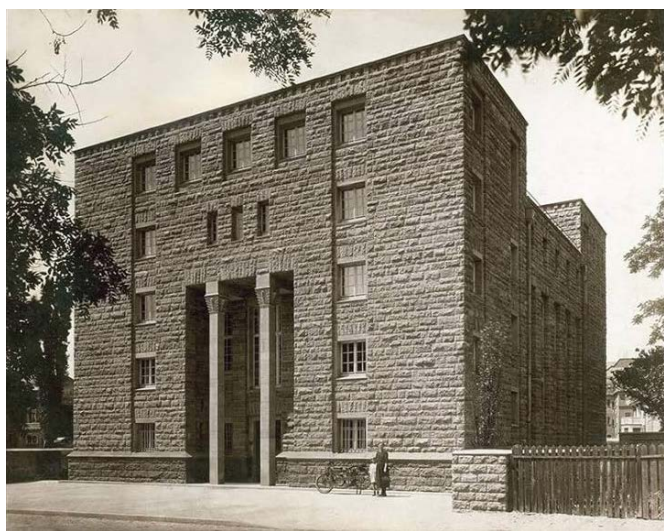
Maggie 實在是一個出色的激勵者,總是成功的在各種場合動員起適當的人才。我最後一次體會到他優秀的能力是在宗座社會科學院的一場會議上,他同時也在2014年擔任了該院的院長。我永遠不會忘記他曾主持一場與會者包含 Bernie Sanders 和 Jeffrey Sachs 的會議。

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果然還是1990年在馬德里舉辦的世界社會學大會開幕式上的那一景象。4000名代表相擠在寬敞的禮堂中,等待著最尊貴的嘉賓上台。西班牙皇后、Maggie 和西班牙國王依序上了舞台。她,即將卸任的ISA主席,雍容華貴且如雕像般,身著一席白衣,莊嚴地向台下揮手。他註定是個不凡之人,有著無人可比擬的才華。她總是給予身邊的人所需的支持,但卻從來不要求他們做出不忠於自己的事情。全世界的社會學家都將會深切的緬懷他,而他對社會學的貢獻也將長存於世。■

2023年6月26日

# > 批判理論和全球社會學： 姐妹同盟？

Stephan Lessenich, 法蘭克福社會研究中心, 德國



1920年代, 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

**在** 社會研究中心成立的一百週年之際，也同樣是所謂法蘭克福學派成立百年的日子，是時候來問為什麼法蘭克福式批判理論會衰落，又是在什麼時候衰落的呢？一般而言，Jürgen Habermas(哈伯馬斯)於1980年代早期提出的溝通行動理論被視為此學派的重要轉捩點。哈伯馬斯的理論不只為批判理論思維中的有效去物質化鋪了一條路，並且也使階級分析和資本主義再生產理論退居後位，甚至被置於邊緣位置。不只如此，Habermas 著重在對自由民主的內在批判，使第二代批判理論毅然決然的往完成政治上現代性的「未竟之事」方向前進；以歐盟作為規範性期望的主要對象，也是晚期現代以及後民族社會的社會民主設計的潛在模板。

## > 忽略全球化的歐洲中心式批判理論

在這樣的背景下，聲稱批判理論在某些層面上忽略了全球化並非誇大的說詞。至少在哈伯馬斯學派的流派中，它主張了某種歐洲中心主義，或說是代表

大部分第一代批判理論學者的西方中心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工人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革命失敗(或缺席)之謎推動了批判理論的萌芽；1930年代初期批判理論開始質疑法西斯主義的物質和社會心理基礎，以及國家社會主義的興起；自1945年起，往後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裡(直到1960年代晚期的學生運動)，推動批判理論發展的問題是：民主是否能深植在後法西斯時代的德國(或說，撇除此一特定問題，轉而問當理性被破壞且成了謎思之後，社會解放的潛力究竟有多大)。因此，縱使批判理論在美國經歷將近二十年的間歇期，直至今日，它仍舊帶著從發展初期就有的濃厚歐洲色彩。正如社會研究所自21世紀初以來聲稱要做的調查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規範性悖論，這可以說是反映了這種結構性偏誤的結果：同樣，以西方現代性的內在批判為中心的科學(或政治)議程，指責其將個體化和自我決定理論從一種解放的承諾轉而變成了一種制度需求。

從世界上其餘(資本主義)地方的觀點來看，這種研究議程顯然是古怪且自相矛盾的。一個世紀以來，無論是西方殖民主義、帝國統治主義，抑或是去殖民化和後殖民主義的歷史，幾乎所有經典和當代的變異都明顯地在近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中缺席。批判理論界並沒有任何重大、廣泛或長久的嘗試，試圖將歐洲和歐洲歷史經驗—或批判理論本身—地方化。直到近期，批判理論家所批評的資本主義再生產邏輯仍舊是西方資本主義邏輯的同義詞：這種批判的規範性視野侷限在參與歐洲啟蒙運動的固定領域；其分析和評斷思維的經驗幾乎參考自西半球(或最近的「全球北方」)富裕民主國家的社會現實(或是被如此描繪的社會現實)。

## > 批判理論與全球社會學

書寫至此，我們應該很清楚，批判理論應當有意將自身向所謂的全球社會學開放。但為什麼全球社會學要擔心批判理論呢？

>>



先讓我就我的理解簡述一下全球社會學的內涵為何。首先，全球社會學的視角是具關係性的，系統性地將資本主義世界下某地的社會現象與另一地正在發生(或已經發生)的事做連結：將西方經濟的成功與剝削其他地區「廉價」勞力和自然資源連接起來；將任何「民族社會」中生活機會的社會結構與(不斷變化的)地緣經濟和地緣政治的統治結構連繫起來；或找出特定政治秩序的潛在合法性與政治秩序穩定運作的成本和條件有效外部化的可能性之間的關係。第二，全球社會學在實證方法是去中心化的，亦即系統性地將構成「現實資本主義」(和資本現實主義)制度的邏輯和世界上各個地方、區域、國家與跨國實體和實踐的多重性納入考量。第三，全球社會學網絡化其專業實踐，它以一種——無論當下情況為何或縱使地位不平等都盡可能合作——的方式，將全球各地的研究工作串連起來，此一非競爭性的研究學界致力於重建全球時代下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批判工作。

顯然，這樣的圖像不僅是典型化，更是理想化的：一個對未來全球社會學理想典型的版本和願景。但現實與理想情況仍存在著差距，特別是在全球社會學的第三特徵上，因為全球社會學家往往被學術領域的政治經濟力量個人化、部門化和國家化。當然，在國際社會學協會或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理事會(地區性的)都有一些相關的核心研究機構中心，也有《全球對話》這本重點期刊，但全球社會學仍舊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 > 批判理論可為全球社會學提供的啟示

再次重申問題：具有去全球化特性的批判理論在全球社會學這條路上能夠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以我的觀點來看，在其歷史根源具反思性的批判理論可以在雙重意義上為正在形成的全球社會學提供協助。一方面，它具有矯正作用，透過給予全球社會學一定的阻力，使其能夠辨別每個角落的「革命主體」，從而使全球社會學避免一廂情願的想法，也避免不經批判的牽涉時下的社會運動。另一方面，批判理論以一種有些自相矛盾的論證方式有效的讓全球社會學認知到，處在我們正目睹的社會扭曲和社會矛盾核心的，正是資本主義，任一學派的資本主義皆是。從佔領美洲到最近強化的歐洲堡壘，資本主義一直且持續在全球發揮作用。面對現實吧：資本主義是會殺人的。

因此，無論是否合理，我都將全球社會學和批判理論視為彼此的盟友；想當然耳，讓他們結盟的正是社會研究和科學批判。■

來信寄至：

Stephan Lessenich

<[lessenich@soz.uni-frankfurt.de](mailto:lessenich@soz.uni-frankfurt.de)>

# > 棉花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的後殖民反思

Gurminder K. Bhambra,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國



棉花種植園。來源：iStock, Mark Castiglia, 2023。

許多社會學取徑——特別是受到馬克思和韋伯啟發的那些，將現代資本主義視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經濟形態。批判理論中關於人類解放與潛能的規範性論述，也帶有類似的觀點，且呼應了 Nancy Fraser 和 Rahel Jaeggi (2018) 將現代資本主義理解為「於歷史中非同步開展的、積累制度的路徑依賴序列」的視角。

這套發展序列的概念，認為現代資本主義出現於歐洲，是起因於小型生產者為了創造商業盈利機會，而打破了封建社會的階層制度。不過，現代資本主義的殖民背景，很容易在此一視角中被忽略。舉例

來說，在海外占有土地、勞動力的現象，與為了創造國內勞動力市場，而在國內發生的圈地運動，兩者的脈絡並不相同。此外，上述現象，也和國內生產所必須的、由國家發起的殖民主義政治進程無關。

在這篇短文中，我將說明為何殖民主義對於理解資本主義極為重要，並解釋資本主義如何形成。如果想要閱讀較長的版本，請移駕到[這邊](#)。這篇文章中，我想藉由一個具體的案例，來說明我的論點，並指出批判理論等社會科學中理解資本主義的方式，不僅忽視了殖民主義的影響，更帶有歐洲中心主義。

>>

## > 沒有棉花的棉花工業

十九世紀中，在棉花工業發展、紡織與織布技術改革等條件下，曼徹斯特從一個小小的地方城市，搖身變為一個聞名全球的城市。這促使曼徹斯特成為工業革命的象徵，人們討論資本主義時，也一定會提到這個城市。

正如 [Utsa Patnaik](#) 所言：一個不生產棉花這項原料的國家，是怎麼以棉花產業為基礎，開展了一場工業革命呢？棉花原生於印度，而非英國、甚至歐洲。種植棉花、製造棉紡紗，最早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印度河谷文明——可以說，印度早就已經是多個地區的棉紡紗出口國。

17世紀，英國東印度公司開始大量進口印度的棉紡紗。17世紀末，這種新型紡織品受到熱烈的歡迎，甚至導致羊毛商向政府請願，希望能全面禁止這項產品的交易；就連「[使用羊毛以外的任何裹屍布](#)」都是違法的。這些政策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其雖然保護了羊毛產業，卻催生了國內的棉紡織業。

## > 社會學與歷史學的視野死角

打壓印度紡織品進口的重商主義政策，開啟了一段長達150年的保護主義時期，卻正好為曼徹斯特的棉紡織業，提供了成功的背景條件。然而，正如Patnaik所指出，研究英國工業、技術革命的眾多歷史學家，包括Deane和Cole、Landes、Hobsbawm、Floud以及McCloskey、Hill等人，都沒有提及這些。以現代世界的崛起和政治經濟問題為研究對象的社會學家們，也同樣忽略了這點。

18世紀初，英國透過成衣紡織品貿易，佔據了全球市場份額的25%。19世紀末，藉由殖民政策，英國已經成功將印度變為供應原料的棉花生產地。印度的製造業被系統性地摧毀，依賴這項產業生存的人們，也受到極大的影響。

不只如此，英國還有另一個原料來源，即美國的奴隸在種植園生產的廉價棉花。19世紀時，棉花種植園不僅存在於美國南部各州，更遍布印度和西非。1840年代，曼徹斯特商會和新成立的棉花供應協會，就曾經試圖遊說印度殖民政府優先種植新奧爾良品種棉花，以供應英國製造業需求。

## > 資本主義由殖民主義而生

如上所述，英國的工業實力，並不是以國家內部的工業革命為基礎；其涉及了印度製造業所經歷的系統性毀滅、強迫勞動的全球種植園經濟，以及對於原料生產地市場的強制開放。是故，殖民主義與那些被視為以工業為基礎的發展現象，以及隨後資本主義的出現，皆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這種過程不僅與(自由與非自由)勞動的剩餘價值佔有相關，也涉及土地佔有、他國地方產業、製造業體系的破壞。

## > 沒有理解就沒有改變

這樣的概念革新之所以必要，是因為大多數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觀點，都集中在資本和勞工之間的關係，以及後者反抗的可能，並將後者視為資本主義轉變的關鍵。正因如此，這些以剩餘價值、資本為批判對象的分配正義觀點，忽視了其他形式的不當佔有。這些被忽略的現象，對於資本主義長期以來的運作與維繫，也是同樣重要的。■

來信寄至：

Gurminder K. Bhambra

<[G.K.Bhambra@sussex.ac.uk](mailto:G.K.Bhambra@sussex.ac.uk)>

# > 邊緣逆寫：殖民經驗的世界化

Manuela Boatcă, University of Freiburg, 德國, ISA歷史社會學研究委員會(RC56)成員

2004年在墨西哥市舉行了一場「與歐洲和拉美對話：批判理論與其當前的批判任務」國際論壇，與會者多為來自德國與拉丁美洲的學者。其中，阿根廷學者 Enrique Dussel 在開幕演講中，以「[從批判理論到解放的哲學：一些關於對話的議題](#)」強調他想要認真看待「對話的主體和其發聲位置 (locus enuntiationis)：我們是誰和我們在哪裡發聲」。此外，Dussel 也表示，這樣的對話並不常發生，他們使用的術語有時模糊不清，也鮮少能夠對等地進行。

除此之外，在 Dussel 眼裡，「具有全球有效性的批判哲學」於二十一世紀的主要任務，尚未完成，但其任務可能是「從那些被排除在全球體系外的觀點出發，和在特定國家中被排除的（貧窮）人士 (Dussel, 2004)。這樣的呼籲也剛好吻合其他早先與當前的呼籲：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學者倡導從底層觀點來分析；來自德國女性主義實體論學者，如 Maria Mies、Veronika Bennholdt-Thomsen 和 Claudia Von Werlhof 則呼籲「自下而上」的觀點；第三波女性主義倡議從「對抗的位置」重寫奴隸與殖民史；和1980、1990年代在種族和性別上數量不斷增加的「立足點理論」。

## > 尚未收到回應的呼籲

時至今日，幾乎在 Dussel 的呼籲近二十年後，底層、邊緣和持反對觀點的，殖民主體的經驗和立場，以及個人在全球知識生產與循環扮演的發聲位置，牢牢地建立在後殖民與去殖民路線的中心。將之並置，這些理論相當於針對全球權力關係的批判，但這等同於批判性理論，或者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換言之，自2004年在論壇上設想的對話機制發生了嗎？

針對這些問題，簡短的回答都是「沒有」。較長的回答可能甚至要從 Dussel 的主張開始，即對於全球經濟差異的視而不見，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者摒棄了「否定批判」，進而「[不再真正批判](#)」存在於邊緣地區的歷史事實與持續地「飢餓導致的負面影響」。Dussel 明確提到 Habermas，並警告說，一個以資本主義體系核心生活水準為出發點的批判性理論，不僅仍然是以歐洲為中心，而且表現出一種令邊緣感到憤慨的「外來偏袒」。後殖民和非殖民方法之間也存在著焦點、範圍和程度上的差異，而同一種方法的世代之間也存在差異。相較於1990年代專注於文化、認同和代言問題的英語殖民取向，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對源自於2000年代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分析的拉丁美洲解殖方法更為重要——但這是事實。今天的情況不一定如此，或不適用於所有學者。委內瑞拉人類學與去殖民學者 Fernando Coronil 在2008年批判殖民和帝國體制不同系譜的文章中指出，在美洲的批評仍然集中在政治經濟的依存度上，但在獨立的新興亞非國家中具體圍繞在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的排序中。在呼籲兩個重要的傳統進行對話的時候，[Coronil更重視互補性而不是差異性](#)：「批判地回應不同地方的殖民主義應採取不同但互補的形式。從亞洲的角度來看，歐洲思想的『本土化』已成為必要，但從拉丁美洲的角度來看，邊緣地區的全球化也變得不可或缺：進而體認到在世界上似乎都是現代大城市中心和落後邊緣地區所構成」。

## > 殷切盼望的回覆

從邊緣—無論是依存理論、底層研究還是去殖民—逆寫回(狹義的)歐洲中心批判理論是重要的一步。世界體系中邊緣地區的社經條件，和核心領域內所謂的非現代社會關係被揭露為現代性及其陰暗

## 「要使批判理論中對等的對話得以發生、延續，我們必須多元化批判理論生產的地理位置和認識論位置。」

面、殖民性的構成要素，而不是被驅逐到現代之外。動產奴隸制及其後果、核心和邊緣的種族隔離勞動力、美洲的剝削資產階級和「二元經濟」、非洲和中東的父權性別關係，以及有酬工資和無酬勞動形式的並存，上述所有殖民地地區的僱傭勞動不再能證明邊緣地區所謂的落後，而是證明殖民和帝國統治造成的糾葛。

為了促使（廣義的）批判理論間能夠產生對等、持續性的對話，我們必須複數化批判性理論在地理和認識論的地方生產。在一個壓倒性、不加批判、當下的、歐洲中心的社會科學中，將殖民和帝國經驗置於歷史現實和當前權力關係的物質基礎上仍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在這樣的情況下，非西方的、非歐洲、非西方、非白人的經驗長期以來遭到抹除。於是，直到晚近20世紀在西方出現了忽視種族、族裔具有不平等、分層特徵的社會學；在資本主義下發展的社會學淡化了奴隸經濟、契約勞工和所有形式的無酬工作；以及沒有殖民者和殖民主體的移民社會學。同時，所有的敘述中都遺漏了女性的經驗，透過將

西方白人女性作為西方社會學生產的客體和主體，也只能部分、逐步地糾正這一點。全球化邊緣的經驗——就 Coronil 的話來說；將邊緣地區全球化——將使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核心進程，如歐洲殖民擴張、奴隸貿易和歐洲人向美洲移民，與西歐工業國家的階級衝突、無產階級化和社會流動性一同凸顯，而社會學正是以此分析為基礎。■

來信寄至：

Manuela Boatcă

<[manuela.boatca@soziologie.uni-freiburg.de](mailto:manuela.boatca@soziologie.uni-freiburg.de)>

Twitter: [@ManuelaBoatca](https://twitter.com/ManuelaBoatca)

# > 整體性與外部性： 去殖民批判理論的範疇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 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 美國

**批**判理論研究社會的標誌性方法之一是「內在批判」。這可以概略地描述為，對於一個既定的社會歷程，是否以及如何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所進行的評估。正如 [Nancy Fraser](#) 所說，批判理論家追隨馬克思（而他在這方面追隨黑格爾），試圖找出社會的「內在」規範，以及社會行動者通過行動所了解到的社會條件之間，「系統性地而非偶然地」產生的矛盾，馬克思的經典例子提到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市場自由以及工人「挨餓的自由」這一反復出現的現實。批判理論家隨後分析了這些危機產生的趨勢，以及危機反過來引發社會變革的可能性。

批判理論家從其所檢驗的實踐「內部」出發制定規範性準則，旨在避開許多主流分析道德和政治哲學的意識形態外衣。主流取徑通常假定「正義」或「平等」等理想適用於不同的時間性和地域，而批判理論家則承認理想具有徹底的歷史性，在不平等的條件下，對理想的訴求往往是為了統治集團的利益。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由的詮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 > 整體性與歐洲中心主義

解殖理論家堅持認為，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阿根廷墨西哥裔哲學家 Enrique Dussel 認為，像內在批判這樣的辯證法的一個核心問題在於其對整體性的自命不凡。在當前語境下，整體性至少有兩層含義。首先，內在批判認為，社會評價和變革所需的所有規範性資源都可以從批判客體內部獲得。只要資本主義社會構成了這一客體，它就組成了批判的工具整體性。其次，與此相關的是，資本主義被視為一個全球性的結構性整體，因為它的發展過程和情懷幾乎形塑了我們星球上的每一個人類社群。

Dussel 認為這種整體化思維是歐洲中心主義的。它有問題地忽視與資本主義社會鄰近但截然不同的許多生活形式。重要的是，所謂客體整體性的外部，即人們的思考、行動和感受與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例外」的地方，在方法論上是相關的。它們提出實質的規範性替代方案，理想、概念、實踐等，通過這些方案可以評估和改造批判客體。例如，非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可以具體展示與自然的非榨取性關係。

## > 分析學與外部性

Dussel 將由此產生的非殖民方法稱為分析法，其中的「ana-」將批判的立場定位在物件的「外部」而非「內部」。與批判理論「從內部」進行的辯證評估相比，從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另一面」（或「底部」）進行思考是解殖思想的獨特貢獻之一。

「外部性」這一分析範疇或明或暗地出現在許多拉丁美洲解殖思想中。其中一個例子是 Mónica Chuji、Grimaldo Rengifo 和 Eduardo Gudynas 在2023年3月出版的《全球對話》中將 buen vivir，也就是美好生活的概念，描述為「南美觀點的集合體」，而其「包含了質疑現代性的立場，同時開啟根基於特定歷史、領土、文化和生態的其他思維、感受和存在方式，的其他本體論」。土著傳統為「美好生活」觀點提供了大量資訊。這些作者指出，「美好生活」在其發源地安地斯國家內外迅速傳播，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具體替代方案提供了理論依據，如憲法對自然權利的承認。因此，「美好生活」這一在外部性中孕育的思想得以進行分析性的批判。外部性的其他重要用途不僅指原住民社群的生活方式，還包括鄉村農民、非裔人口、城市貧民，甚至是該地區未開發的民族國家。

## > 資本的全球影響力

對馬克思主義曲徑的批判理論家來說，分析可能會被誤導。他們認為，對資本主義的任何外部假設都是浪漫主義式的，否定了 Immanuel Wallerstein 所稱的「現代世界體系」在過去500年的穩固。這是不理解當代世界尺度內的社會領域，是一個由相互關聯的部分所構成的結構；具體而言，它是透過動態經濟過程和社會實踐集合而成，由人類行動的進行，所支撐的剩餘價值積累。根據這一觀點，核心與邊緣、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富人與窮人、雇傭勞動與非雇傭勞動等之間的關係，並不是嚴格分離的關係，而是系統性整體的組成部分間以及其中的關係。此外，資本的影響力是全球性的。進行貨幣交易、參與全球市場上游或下游的地方市場、負債、與開採公司和使

>>

# 「批判理論家指出『正義』或『平等』等理想，具有深厚的歷史性。」

用武力維護主權的國家，都與這一整體發生有意義的聯繫。用 Dussel 和其他拉美解殖思想家常用來描述外部性的副詞來說，很少有(如果有的話)社區能夠「絕對地」、「徹底地」或「最大限度地」脫離資本主義經濟迴圈。

有鑒於馬克思主義的這一憂慮，那些使用外部性範疇的人必須澄清，資本主義現代性作為整體與外部社區的不同之處並不是物質性的。大多數非殖民主義思想家都接受世界體系理論：沒有世界體系理論，我們就無法充分理解當代形式的剝削、榨取或壓迫。相反，相關的分離是經驗性和規範性的。也就是說，居住在外部世界的人們會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感受和判斷。這可能包括與市場的互動不同於系統性地從市場中獲益的階層。

## > 現代二元論的問題

然而，這種回答並不能滿足那些批判理論家，他們本著後現代的精神，對著名的分析性議程中關於「現代性」的概念提出質疑。在他們看來，分析性議程將現代性規定為一種文化整體，包含了由工具理性、資本主義積累、殖民主義等等所塑造的思維和情感方式，而「他者」的思維、情感和存在則從根本上與之截然不同。

對於後現代傾向的批判來說，這樣的現代性概念首先在政治上是可疑的。將各種文化重新整合為具有凝聚力的整體強化了二元論的思維模式，包括自我/他者的分類。正如 Edward Said 等後殖民主義思想家所警告的那樣，這種分類很容易被用來控制「他者」們。其次，它在描述上是錯誤的：社會生活的形式是歷史上偶然的、異質的實踐組合，可能通過跨文化交流而發生變化。此外，賦予這些實踐意義的符號也可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進行轉換，發揮與其發源地不同的功能。正如「美好生活」的宣導者所言，生活方式與其發源地之間可能存在聯繫。然而，不應假定這種聯繫是必要、不變或根本無法溝通的。

## > 作為混合文化的外部性與規範性資源的多元性

那麼，那些使用外部性範疇的人不應該從「現代性」，而應該從「現代化」的角度來思考。這是一個社群參與現代的實踐、符號、技術和理性的過程，比如在市場上遇到的那些。此外，由於在物質和政治上融入了世界體系，社群不得不參與其中。(在這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不對稱的權力影響著跨文化進程)。借用拉美文化研究的術語，外部性是一種「混合文化」，其中的參與者每天都可能從多種並存的理性，「現代」和「傳統」、商品化和非商品化，從中汲取養分。例如，為傳統習俗賦予現代意義，為新引入的習俗賦予歷史特定意義。在世界各地，我們遇到了多重現代性：許多不同的、不斷變化的混合文化，以現代形式在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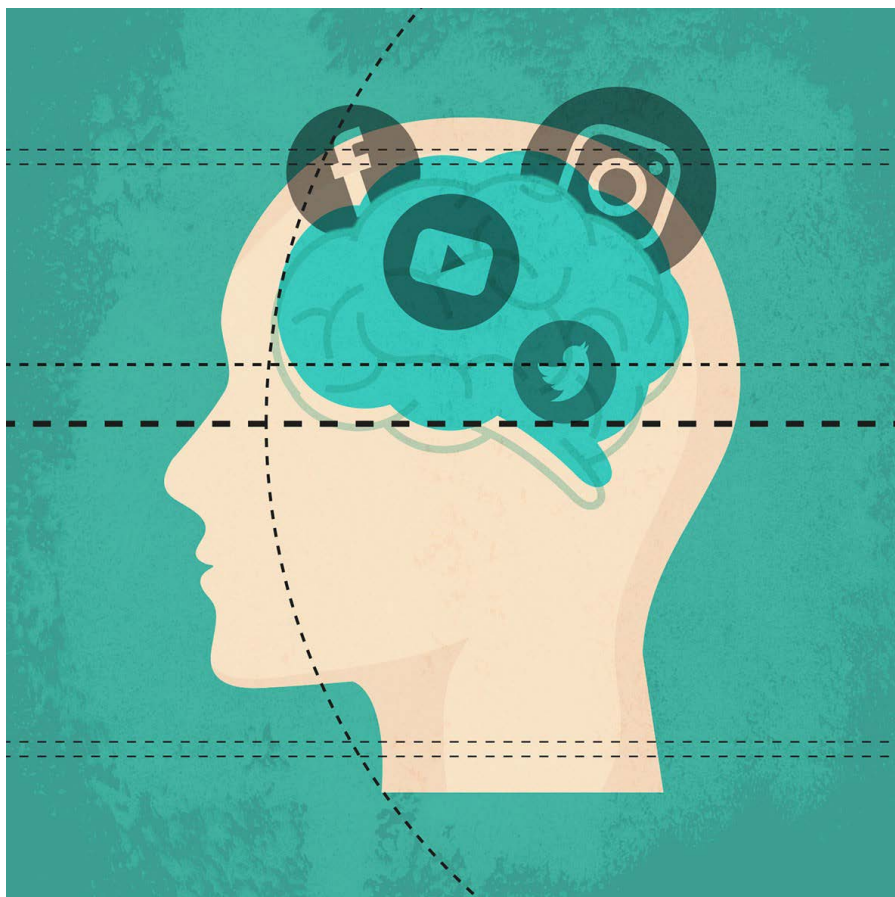
外部性的範疇正確地強調了思維、感受、存在和價值觀因地而異，尤其是在世界體系中的核心與邊陲(誠然是異質的)之間。但是，考慮到後現代的憂慮，我們必須認識到各地之間的關係是無孔不入的、動態的。我們應避免將外部性社群浪漫化，也不應忽視那些即使身處全球北方和西方，但其實踐意義卻超越了所謂「現代」理性的人，如照護工作。內部批判和分析批判都需要對全球結構(即整體性)有深刻的理解。然而，通過強調外部性，分析批判將我們的注意力轉向了存在於世界各地，尤其是邊陲地區的龐大多元性的規範性批判資源，以及它們可能提供的多種轉型途徑。■

來信寄至：

Patricia Cipollitti Rodríguez  
<[patricia.cipollitti@gmail.com](mailto:patricia.cipollitti@gmail.com)>

# > 文化工業：一個批判理論的(政治)研究議程

Bruna Del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 · Frankfurt University, 德國, 和 University of Campinas, 巴西



| Arbu 繪, 2023。

## > Adorno 與文化工業

“文 化工業是一個具爭議性的概念。儘管 Theodor W. Adorno 對於將「大眾文化」一詞與「文化工業」相提並論持保留態度，但後者仍普遍被認為是(大量)文化商品的集合。在諸多社會學的學科分之中，「文化工業」或其某些面向已成為文化商品的代名詞，例如電視或廣告。在他和 Helmut Becker 的論辯中，Adorno 警告我們不要接近電視自身，而只能與文化工業體系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僅僅從經驗來研究文化工業有其限制，因為其成效只有經過數十年才能顯現。然而，Adorno 和 Max Horkheimer 在《啟蒙辯證法》中將文化工業描為為由「廣播、電影和雜誌」組成的「體系」。這是一個美感和文化體系，但或許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社會化體系和一個製造慾望和對現實

的認同的機器。這個概念包含了學術界索忽視與勞動相關的部分，因為它是工作的對立面：福特主義社會的反面鏡。然而，它也是一種文化的政治理論。

## > 媒體和法西斯主義的興起

威瑪共和國期間的文化卡特爾化及其集中在以 Alfred Hugenberg 為代表的反動勢力手中，促使 Adorno 思考媒體與法西斯主義崛起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廣播改變了反民主的鼓動；另一方面，文化工業的社會形態削弱了主體性，產生了對超級巨星的認同，為法西斯政治領袖鋪設了一條康莊大道，同時又以「無私的、超越黨派的權威」的形像現身。

在《新右翼極端主義的面向》中，Adorno 批評了德國國家民主黨成功的秘密在於「組織」的概

>>



念。NPD將自身偽裝成一個超脫黨派以外的運動。這場「運動」分離了傳統形式的「政黨」，區分以政治和經濟利益引導的現實政治(Realpolitik)制度。此外，Adorno認為是其是從政治宣傳來達成目的。從Adorno發人深省的論述中可以推論出其原旨：文化工業可以成為新的「組織」。這樣的工業可以取代群眾政黨來建構和擴張法西斯主義的版圖。

儘管 Adorno 透過他的著作將「文化工業」的概念轉變為一個研究議程，但連他自己也無法預見此一體系所能擔負的比例和範圍。

## > 網路的無私性權威取代了舊政治

在網際網路來臨之前，反民主煽動者必須親自去學校、教堂、廣播站、工廠、電視攝影棚等等。在這些地方，其使用權被特定法規管轄和限制。福特主義下的文化工業，藉由廣播作為最主要的法西斯主義工具，利用廣播將煽動者帶入客廳，然而這並不發生在政黨之中。生產力的最新發展，即社交網絡在當代社會中的出現和重要性，已經打破了此類煽動的任何障礙，甚至連最傳統的傳播方式也失去了合法性，並將傳統的群眾政黨排除在外。社交網絡表現出比任何組織所渴望更多的社會毛細管滲透作用。

這些基礎設施也創造了這類「數位文化工業」的物質基礎及其所採取的「文化」形式。「喜歡/不喜歡」的二元裝置、與行業壟斷相關的鎖定效應、透過定向廣告操縱情緒以及許多其他人人皆知的特徵，為虛擬社交和社交的形式提供模型。與之相關——更不用提使用機器人等在社群媒體和網路中進行政治操弄了。

此外這種新的右翼激進主義的成功，是由於文化工業在其數位版本中繼續塑造自己為「無私的權威」。它的經濟特徵隱藏在其產品的「自由本質」背後，由於我們是生產和分享大部分內容的人，使得這個事實變得更加模糊。作為一個「無私的權威」，它不僅將自身塑造為「盤旋」在傳統政黨之上的某種東西，而且還成為旨在替代舊政治的右翼運動的理想工具。

## > 新興極端右翼與社群網絡

因此，高度綜合的客觀機構和極度有利於極右的主體化模式之間存在同樣的趨向。新的右翼激進主義動員了一種難以對話和反思的政策，這與社群網絡的特徵密切相關，例如：透過使用具有強烈情感吸引力的點擊誘使支持激進化的投注注意力政策；產生政治參與感的能力；選擇人們消費什麼的演算法，反過來產生內容循環並排除一切多樣化，促使內群和外群的形成。正如 [Joseph Vogl](#) 關於平台的建議，數位文化工業變得準民主化。

除此之外，這些因素增強了地方威權主義，其基礎可能極其多樣，擴大原有的範圍，使其對政治生活具有重要意義。在歷來被殖民主義削弱民主的全球南方國家，文化工業的影響力可能更為深遠，這揭示了這個概念一個未被充分探索的面向：其帝國主義的展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工業也可能是一種文化帝國主義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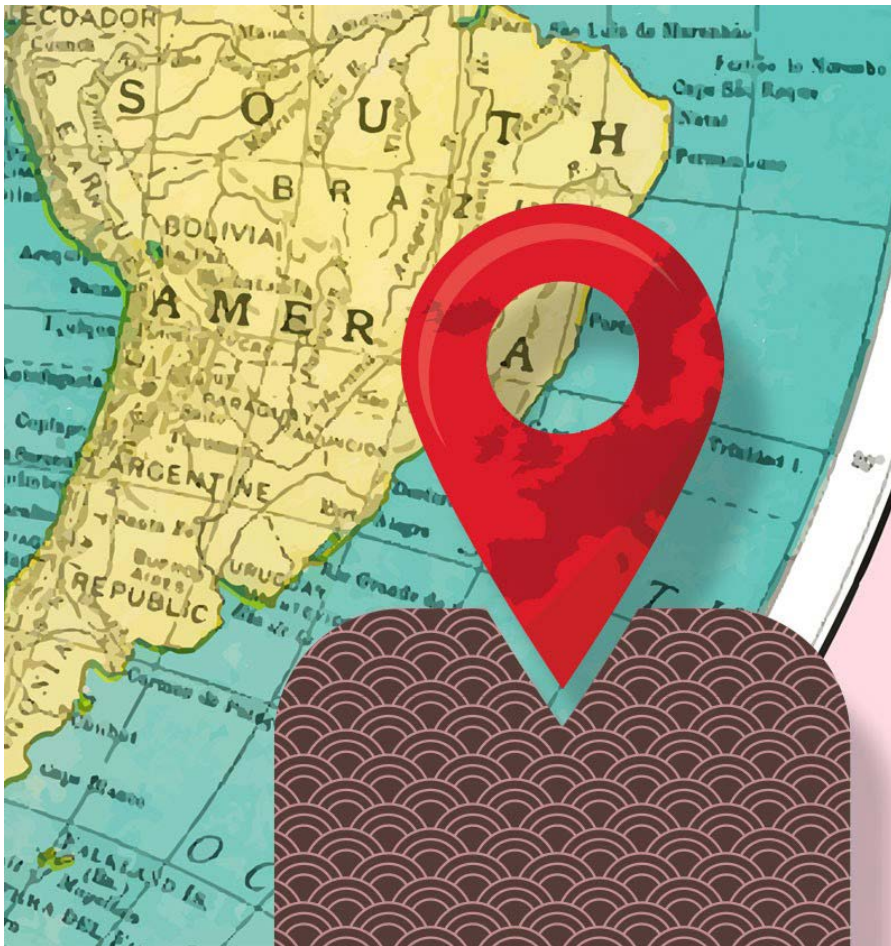
全球極右翼的興起重新點燃法蘭克福學派極權主義的研究興趣。即便如此，「文化工業」並不被視為能夠對應到此一現象的理論。批判理論(以及世界)的未來無疑地與擴張、嚴謹地修正和文化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息息相關。然而，我們首要的任務，仍是不與世界同步。■

來信寄至：

Bruna Della Torre de Carvalho Lima  
<[brunadt@unicamp.br](mailto:brunadt@unicamp.br)>

# > 邁向全球社會的批判理論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 阿根廷



| Arbu 繪, 2023。

1920到60年代, 批判理論在西半球的發展主要源自在法蘭克福和紐約的社會研究所。在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機構陷入困境的時期, Horkheimer、Adorno 和 Marcuse 的研究在當時具有強烈的影響。另一方面, 批判理論在1960和70年代的拉丁美洲社會學和經濟學領域也有著蓬勃的發展, 包括 Raúl Prebisch、Fernando H. Cardoso、Darcy Ribeiro 以及 Ruy Mauro Marini 皆為當時傑出的研究者。然而, 這兩個思潮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第一、他們關注的結構性問題差異甚大, 再者, 兩邊知識分子所擁有的歷史經驗也迥然不同。除此之外, 拉丁美洲的批判理論更與主流政治緊密聯繫。因此, 即便兩地區的理論發展都是以 Marx 和 Weber 的著作作為核心理論來源, 但只有深度了解其各自歷史地域對知識分子與批判理論所產生的獨特影響, 才得以解釋為何同樣傳承德國思想的兩個思潮卻存在如此大的差異。

## > 歷史經驗與結構性問題

每種批判理論都形塑於歷史經驗和結構性問題的交織性之下。區分這兩面向, 則有助於我們了解批判理論究竟是從何時開始失去了對知識的貢獻與促使社會變革的能力。我們發現納粹大屠殺猶太人的歷史經驗, 使得法蘭克福學派特別將個人自由的喪失視為主要的結構性問題。若是沒有這段經驗所帶來的傷痕,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則可能呈現出不同的面貌。而當拉丁美洲地區發展起飛時, 他們對核心國家的結構性依賴問題日益嚴重, 他們的理論就是於此脈絡下發展起來。當時一些邊陲國家發現歐洲學界的理論已明顯不適用於他們身上, 因此開始對某些問題提出研究和批判理論。另外, 隨著工業化競爭失利, 批判理論在拉丁美洲變得更加重要。然而, 出於對建設後資本主義社會而非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可能性的理性信念, 拉美社會理論依然保持積

極的發展。這既不同於馬克思學說所呈現的純粹消極性，也不僅是純粹積極性。我提到了兩個不同的結構性問題，他們與兩種歷史經驗有關，並依然存在於當今社會。最後，可見要克服長久以來自由與發展不足的問題，就必須建構出新的批判性理論，以闡釋當前全球化的歷史經驗。

### > 當代理論的偏差：非歷史主義、反政治與分離主義

目前在拉丁美洲和歐洲發展的大多數的批判理論似乎已漸失影響力，其原因可以歸結為三種核心思想的偏差以及長期存在的還原論知識的再生產。這三種偏差包括：非歷史性的偏差、反政治的偏差和分離主義的偏差。首先，結構性議題的理論定義和公共研究議程的發展中，常常忽視了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再者，反政治的偏差與將批評本身視為唯一目的有關。第三，分離主義偏差出現兩種矛盾對立的做法：一方面，他們將批判理論被孤立出來，脫離了社會學研究；另一方面，他們在缺乏社會批判理論（特別是缺乏資本主義理論）的情況下進行社會研究。Horkheimer 和 Adorno 將這種方向的研究稱為「沒有社會的社會學」。最後，長期以來對於還原論的問題與廣泛複製歐洲中心主義社會觀有關。二十世紀中，由於邊陲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已進入後期的解殖民進程、亞洲國家崛起等因素，城市的世界化（mundialization）逐漸出現。然而，在城市世界化遭受否定的情況下，這套佔據支配地位且自我中心的觀點，原先就已經受到侷限，如今又更加的不理性且盲目。

### > 法蘭克福學派與拉丁美洲社會學

世界化進程是使法蘭克福傳統與拉丁美洲傳統之間差異逐漸消弭的重要歷史經驗。最初雙方的交流經驗可提供重要觀點，以克服上述的理論所面臨之困境。而我們若仔細觀察，會發現這兩種學術傳統都發揮了防止非歷史偏差的作用；因此，Marx 之後的思想家如 Horkheimer、Marcuse 和拉美的思想潮流，都提供了抵制反政治偏差的建議。同樣地，在努力克服分離主義偏差的過程中，想辦法整合法蘭克福的貢獻，以及 Adorno 和 Horkheimer 對實證

主義的深刻批判，都成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後，嘗試全面挑戰與重構歐洲中心主義的過程，我們一樣必須參考拉丁美洲的學術貢獻。

為了克服上述困境並恢復批判理論的活力，我們迫切需要推動能發展新的全球社會批判理論的一套典範。我指的是一種理論實踐，應被視為社會研究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並透過科學式方法重啟批判理論，最後透過社會轉型策略來檢視此理論。此外，我們也需要構建一個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具有全球社會觀點的概念，並且將其視為在三個互動層面中實現的具超越性的統一概念：一、國家、地區和全球之間的關係；二、中心與邊緣的互動；三、現代性和非現代性之間的關係。

由 Stephan Lessenich 領導的法蘭克福學派新綱領，是自1923年以來最有抱負的改革轉變。它獨特之處在於將自身置於全球化的歷史經驗中，藉此界定其結構性問題；此外，它也承諾參與科學、批判性思考和政治行動，以應對歐洲外的社會轉型議題。■

來信寄至：

Esteban Torres

<[e.torres@em.uni-frankfurt.de](mailto:e.torres@em.uni-frankfurt.de)>

# > 減碳共識

**Breno Bringel**，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巴西，以及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de Madrid，西班牙；**Maristella Svampa**，CONICET 以及 Centro de Documentación e Investigación de la Cultura de Izquierdas，阿根廷



與 Aerocene Pacha 一起飛 (Salinas Grandes 和 Laguna de Guayatayoc，於阿根廷胡胡伊省，2020 年)。  
來源：Aerocene 基金會和 Tomás Saraceno 工作室。

近年來，社會生態轉型已然成為當代政治、經濟議程的核心焦點，不再侷限於社會運動和科學相關群體中。這涉及到兩個問題——首先，由於迫切地追求減碳，原先涵括能源、生產、食品和城市等面向的社會生態轉型，似乎有被簡化為能源轉型的趨勢。其次，則是能源轉型該如何進行，以及相關成本將由誰承擔。

能源轉型的目標是所謂的「乾淨」能源，其由全球北方的大型企業及政府推動，卻為全球南方造成了壓迫。許多位於全球邊緣的地區，為了讓中國、美國和歐洲淘汰化石燃料能源而犧牲。舉例來說：生產電動汽車的高科技電池，需要開採

>>

鈷和鋰，而鋰三角（拉丁美洲和北非）便受到很大的影響；中國和歐洲國家建設風力渦輪機，需要大量巴拉木材，這摧毀了當地的社群、領土和生態多樣性；要開發太陽能板和氫能等大型設施，就需要大量空間，而過程中人們進行的土地交易，則進一步加劇土地佔有現象。

前述的現象，在行動主義和批判研究等領域中越來越受關注，並被稱為「綠色剝削」或「能源殖民主義」——在綠色能源轉型的過程中，一種嶄新的、資本主義的資源剝削和佔有形式出現了，其針對（但不限於）全球南方。我們將這套新的資本主義共識，定義為「減碳共識」（decarbonisation consensus）。而能源殖民主義，便是這套共識的核心。

## > 減碳共識是什麼？

減碳共識是一套新的全球共識，提倡的是將化石燃料導向的能源系統，轉型為「再生」能源的零碳（或低碳）能源系統；核心思想則是對抗全球暖化、氣候危機，推動以消費電氣化與數位化為基礎的能源轉型。這套共識反映出的，是廣為人們接受的某種認知——身處於這樣一個面臨崩毀、危機的世界，誰又能反對減碳和改善極端氣候等追求呢？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思考的並不是要做什麼，而是該如何做。

這套減碳共識已經佔據了支配地位，且其主要動機並不是分散能源系統、關愛自然、全球氣候正義之類，而是催生新的財政激勵政策、減少某些國家的能源依賴性、擴大市場、改善企業形象等等。改變社會代謝的機制，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其中涵蓋生產、消費、貨物流通和廢物產生模式等面向；然而在此意義下，減碳不只是改善社會代謝機制的一環——減碳本身就是目標。雖然人們已經意識到氣候危機有多嚴重，但是在自然資源開採加劇、經濟無限增長仍是人們的主要思維方式等情況下，現況下的政策不只無用，還可能對現況造成負面效果。

科技的潛力和創新，以及「綠色商業」、「氣候金融」、「自然基礎方案」、「氣候智能礦業」、「碳市場」等概念，還有各種形式的投資，經常在減碳共識的論述中被強調。總結來說，這項共識所產出

的轉型方案，是以商業邏輯為基底，並藉由數位化的包裝，創造出了新的商品，以及更多複雜的社會和領土控制模式。

隨著永續的論述急轉彎，全球南方進入了新的環境剝奪階段，有數百萬人類與非人類等知覺生物受到影響，生物多樣性受到危害、策略性生態系統也遭到摧毀。全球南方再次成為擁有不竭資源的倉庫，供全球北方在能源轉型之際，可以策略性地提取礦產資源；同時，南方也成為這個新的「工業革命」的垃圾場，接收了能源轉型所產出的廢物和污染。

## > 綠色殖民主義與雙重束縛

減碳共識動員了新殖民主義生態化的想像與實踐，背後瀰漫著生態帝國主義與綠色殖民主義的痕跡。舉例而言，現在的政府和公司經常使用帝國地緣政治當中典型的「空間空白」概念。同樣的概念，過去曾由 Ratzell 的「生活空間」延伸出來，並導致生態災難、土著族群滅絕，更被用於推動「發展」和「殖民」政策；如今則在投資「綠色」能源時，被用於正當化領土擴張主義。

藉此，人口稀少農村地區的大片土地，就成為了適合建設風車或氫能工廠的「空白空間」。企業轉型的地緣政治想像，可以說是再現了殖民關係。這樣的關係是從某種被強加於南方的、來自北方的壓迫；在某些情況下，則是某種「內部綠色殖民主義」，使殖民聯盟、國內外菁英的綠色剝削得以可能。在「綠色轉型」的名義下，減碳共識也對全球北方的領土帶來壓力，不過，這和全球化下邊緣地區受到的影響比起來，還是相差許多。

此外，減碳共識的實踐形式及暫時性，觸發了許多人，甚至其支持者的不滿。思覺失調行為與政策的惡化——或以 Gregory Bateson 的話來說的「雙重約束」（double bind）（見其著作《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似乎是文明同時面臨多個多危機的跡象之一。像化石燃料公司這類人，雖然意識到這些跡象的存在，卻還是會遊說政府，試圖提取更多的石油，藉此延遲減碳。舉例來說，美國總統 Joe Biden 違背了競選時的承諾，在2023年3月批准了 Willow 計畫。此計畫的推動，意味著阿拉斯加地區的石油

開發將近一步展開，使得如今已因全球暖化而極脆弱的生態系統，面臨更大的威脅。另一個例子，則是歐盟於2022年中選擇回歸煤炭，並以烏克蘭戰爭加劇了能源危機為藉口。

減碳共識透過巴西研究員Camila Moreno設計的**碳公制**，侷限了抵抗氣候變遷的形式：藉由這種測量二氧化碳分子的碳計量公式，減碳共識為國際交易提供了一種貨幣，使人們誤以為已經有人針對環境退化採取行動，掩蓋了真正的問題。事實上，地球的自然和生態污染仍持續加劇，不只如此，污染還變成了新的商業領域（例如人們進行碳排放量的買賣）。除非我們能改變這樣的動態、破除此種消費模式，否則任何數量的鋰或礦物資源，都不足以解決環境問題。

總之，轉型不僅是能源結構的改變，如此只會促使不能永續的模式持續存在。減碳共識以企業邏輯為基礎，提出了短程的能源轉型方案，確保發展計畫仍然佔據支配地位，並加速了代謝斷層，以維護當代——特別是全球北方與經濟最為富裕的部門中——的生活和消費模式。減碳共識提倡的後石化邏輯，促成了一場企業化、科技化、新殖民主義化且非永續的能源轉型。

### > 重演歷史的資本主義共識：不可避免性、企業控制與剝削

從社會歷史過程的角度審視減碳共識，可以發現其特徵與過去的資本主義共識（即華盛頓共識和**商品共識**）極為相似。首先，上述共識皆有不可避免性論述，聲稱現況下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舉例來說，商品共識的前提，是人們已經接受，世界各地的原料需求都不斷增長，而剝削則是必然的結果。同樣地，現在的減碳共識也試圖構築這樣一種觀念——面對氣候變遷的唯一、實際的方法，就是企業化的能源轉型。

第二，上述共識都可能導致權力大量集中於非民主行動者身上（如大公司、金融機構和國際組織），從而使民主治理不再可能。這樣的趨勢有兩個影響，一方面，企業佔據了治理者的位置——COP作為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最高機構，應該要是由多方勢力所組成，但類似機構卻成為了綠色資本主義的商業展覽，以維持既存的北方—南方能源權力關係為目標。另一方

面，不管是在全球供應鏈的起點還是終點，權力也越來越被大公司所掌握。

第三，兩者皆試圖擴展資本主義，且有許多實際作為，例如：推行旨在控制、剝削和出口自然資源的大型計畫。為達成此目標，其藉由法律基礎來確保資本的「法律安全」，最大化企業的盈利。舉例來說，歐盟正談判的新雙邊貿易協定，便納入了能源和原料的章節；更於最近提出了關鍵原料法規。兩者表面上是為了確保歐洲有充足的關鍵原料，然而，正如一份**SOMO報告**指出，這項措施沒辦法達成這個目標，反而會加劇對人權和環境的風險、破壞合作國家的經濟動態，並深化富國的非永續消費。

### > 新特徵：帝國競爭、能源安全與氣候殖民主義

除了上述相似的部分，減碳共識也有一些新的特性。如今，在一個多極世界中，存在著相互競爭的帝國，這也導致減碳共識的重要特徵之一，是更加複雜的新殖民關係。有直接取得重要礦物需求的，不只是缺乏這些礦物的歐盟。而中國這邊，即便擁有這些礦物，其仍在全球南方中處於極佳的位置，並於近二十年間持續地將資源投入剝削當中，這和美國、歐洲的形式非常不同。

中國正試圖和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建立一種新的依賴關係，在這種關係裡，中國成為了這些國家的主要貿易對象。中國的投資是長期的，並涉及不同領域，例如農企業、礦業、石油或與剝削相關的基礎設施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科技轉移，尤其是綠色轉型方面，中國傾向於使用最前沿的科技，這有時也包括中國的勞動力。

就連美國也參與在這場帝國主義的角力當中。雖然美國國務院的聲明，並沒有提及這些議題，不過美國南方司令部的負責人 Laura Richardson 曾經在多個場合明確指出，南美洲的水、石油、鋰等資源對美國說是有戰略利益的。另一件值得提及的是，作為多極世界中佔據支配地位的行動者，俄羅斯在能源轉型領域的這場角力中，影響力是完全不及前述大國的。

三種共識間的另一個差異，是國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們知道，華盛頓共識主張極小化國家，而商品共識則主張國家與跨國資本結盟的同

時，仍具有一定的協調功能。相比之下，減碳共識似乎展現出一套新的規劃型國家主義，其中，國家更具有生態企業的特性，結合了綠色轉型、促進公私基金和自然金融化等措施。一方面，政府機構和國家有時會傾向於支持私人企業或與之合作，以實現綠色轉型的目標；這種情況下，公共部門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屈從於私人企業的利益，導致公共和私人之間的緊密關係。另一方面，這樣的情況也可能引發激烈的抗議活動，此時國家便會試圖藉由促進生態社會轉型、鼓勵權力分散和去中心化，重建相對自主性。

雖然商品共識和減碳共識都具有採礦邏輯，但兩者需要的產品和礦物並不完全相同。在商品共識中，主要受到關注的是食品產品、烴類（石油、天然氣等）以及一些金屬礦物如銅、金、銀、錫、鋁土岩和鋅；脫碳共識則不同，除了上述傳統礦物外，更將重點放在能夠實現能源轉型的關鍵礦物，例如鋰、鈷、石墨、鈾以及稀土元素。這兩種共識都涉及礦物的開採和出口，但減碳共識的特

殊之處，在於推動者會試圖透過論述來正當化其行動。他們聲稱，這種綠色採礦是永續的，且是面對氣候議題的唯一可行方案。

簡而言之，我們需要了解近年來氣候和生態問題經歷了怎樣的意義轉變。除了過去的那些敵人，減碳共識正逐漸長程一個更加複雜且精細的體系，我們必須透過社會運動，以及找尋其他替代方案，來應對這個挑戰。■

來信寄至：

Breno Bringel

<[brenobringel@iesp.uerj.br](mailto:brenobringel@iesp.uerj.br)>

/ Twitter: [@brenobringel](https://twitter.com/brenobringel)

Maristella Svampa

<[maristellasvampa@gmail.com](mailto:maristellasvampa@gmail.com)>

/ Twitter: [@SvampaM](https://twitter.com/SvampaM)

# > 北非的能源轉型：殖民主義、剝奪與徵用

Hamza Hamouchène, Transnational Institute 和 Algeria Solidarity Campaign, 阿爾及利亞



摩洛哥的瓦爾扎扎特太陽能發電站。來源：iStock，2022 年。

某些再生能源的轉型措施可能具有剝削性質，並連帶支持了現有的剝奪、依賴和霸權體制。我將舉北非地區（尤其是摩洛哥）的幾個例子，以顯示能源殖民主義是如何透過綠色殖民主義或綠色掠奪被再製。

摩洛哥政府訂定了一項相當有野心，同時也值得肯定的目標：2030 年，國內再生能源能在其能源結構中佔比達到 52%（按裝置容量計算）。然而，若我們追求的是「公正的轉型」而非單就形式上的轉型，那我們就需確保社會中的貧困人口和邊緣群體得到實質受益。我們需注意到，這個計畫若使得他

>>



們在社會經濟上的弱勢狀況更加惡化，那我們即需對計畫進行批判性的評估。

2016年瓦爾扎扎特太陽能發電廠開始運營時，正值馬拉喀什舉行氣候談判(COP22)的前夕。此發電廠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太陽能發電廠，摩洛哥國王也因此被歸類為再生能源的支持者。然而深入瞭解後，我們發現此立意良好的計畫的另個面向：首先，這個佔據 3000 公頃的太陽能發電廠建在阿馬齊格農牧民社區的土地上，卻未曾經過居民的同意，形成了土地「綠色搶奪」的狀況。其次，此項目的建設是與世界銀行、歐洲投資銀行等受私人利益團體所掌控，並與他們簽訂了高達 90 億美元的債務協議而實現的項目。摩洛哥政府原先就背負著相當沉重的債務，而現在債務的負擔只會更加繁重。第三，儘管這個計畫宣稱自己是綠色環保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使用聚光太陽能(CSP)需要大量水資源進行冷卻和清潔太陽能的電池板。因此，顯而易見地，若是要在像瓦爾扎扎特這樣的半乾旱地區挪用飲用和農業用水的資源，這樣的決策是相當不合適的。

「Noor Midelt」專案是摩洛哥太陽能計畫的第二階段，期望能提供瓦爾扎扎特更多能源。此計畫融合了混合型的聚光太陽能熱發電和太陽光電系統技術；第一階段預計可提供800兆瓦的電力，使其成為全球最重要的CSP和PV技術結合的太陽能項目之一。2019年5月，摩洛哥太陽能局招攬了由法國的 EDF Renewables、阿聯酋的 Masdar 和摩洛哥的 Green of Africa 組成的企業財團聯合體，負責建造和運營此設施，合約為期25年。截至目前，此項目已簽署20多億美元的債務合約，包括與世界銀行(WB)、非洲開發銀行(AfDB)、歐洲投資銀行、法國開發署(AFD)和德國復興信貸銀行(KfW)的協議。

計畫於 2019 年啟動，預計於 2024 年正式委託於委任公司進行。Noor Midelt 太陽能綜合計畫位於摩洛哥中部的上穆盧亞高原，佔地4,141公頃，距離 Midelt 鎮東北方約 20 公里。該地區由 Ait Oufella、Ait Rahou Ouali 和 Ait Massoud Ouali 三個少數族群的農業社區管理約2,714公頃的公有土地。同時，約1,427公頃的土地被宣佈為林地，並由這些社區管理。然而，根據國家法規規範，這些居民的土地可能被徵用為提供公眾利益的政府用地。行政法院於2017年1月做出利於摩洛哥太陽能局的這項徵用決定，法院判決也於同年3月公開。

## > 殖民主義式的環境敘事

這讓人聯想到一直以來的殖民主義環境敘事，這種敘事將被徵用的土地稱為邊緣化和未充分利用的土地，因此可用於投資綠色能源。2018年，世界銀行的研究再次強調「這片土地由於缺水，其沙質乾旱的地形只允許小灌木叢生長，不適合農業發展」；但事實上，與上述說法類似的呼籲在2010年左右，就已在對於瓦爾扎扎特工廠的宣傳被引用。對此，當地一位居民卻表達了相反的看法：

「計畫人員說這是一片荒蕪的沙漠，但對這裡的人們來說，這不是沙漠，而是牧場。這是他們的領地，他們的未來就在這片土地上。你們奪走了我的土地，也就奪走了我的氧氣。」

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更進一步指出「該計畫的土地徵用對當地社區的生計，並不會造成影響」。然而，數百年來一直在這片土地上放牧的西迪阿亞德(Sidi Ayad)游牧部落卻反對這樣的看法。一位年輕的牧羊人 Hassan El Ghazi 在2019年向摩洛哥 ATTAC 組織中的一位社運人士表示：

「我們的職業是放牧，現在這個項目佔據了我們放牧的土地。他們在項目中沒有僱用我們，卻僱用了外國人。我們原先居住的土地被佔用了，他們摧毀了我們建造的房屋。事實上，我們是受到壓迫的，Sidi Ayad 地區也同樣被剝奪該有的權利。我們的孩子受到壓迫，他們和我們先祖的原有的權利消逝殆盡。我們成為不識字的『文盲』，我們的孩子也沒有上過學……原有的道路和小徑都被切斷……最終，我們成了不被看到也不被關注的人們。對他們而言，我們根本不存在。我們強烈呼籲政府官員們關注我們的處境和使用這個地區的權利。在如此的政策下，我們猶如隱形人。我們寧可去死、寧可去死！」

## > 抗議與抵抗

在這樣一無所有、苦難、低度開發和充滿社會不正義的背景之下，2017年以來，西迪阿亞德民眾就曾透過多次抗議活動表達他們的不滿。2019年2月，他們舉行了一次公開的靜坐示威。這場示威活動使得 Union of Small Farmers and Forest 聯盟的成員 Said Oba Mimoun 被捕，並被判處 12 個月的有期徒刑。

同樣，一位長期支持西迪阿亞德部落鬥爭的工會成員 Mostepha Abou Kbir 描述了這片土地如何在未經當地社區同意的情況下被強硬佔據。目前，這片土地被封鎖並禁止任何人接近。他將摩洛哥國家的大型開發項目與西迪阿亞德地區缺乏基本基礎設施這兩個項目進行了比較；此外，他也指出佔地和資源掠奪以外的另一個層面——為了支持這些大型計畫（Midelt 太陽能發電廠將從附近的 Hassan II 大壩供水），Drâa-Tafilalet 地區的水資源不只遭到破壞，當地社區卻也未從中受益。在計畫案的開發過程，小牧民被驅趕離開，當地導致了生計困難；然而，計畫案獲益的財富卻是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此外，再加上家畜市場的商品化與長期的乾旱，以上因素都將加劇對此牧民社區生計的威脅，使得他們在社會上的處境更劇邊緣化。

不僅西迪阿亞德部落對該計畫有許多關注，推行 Soulaliyate 運動的婦女也長期要求 Drâa-Tafilalet 地區有權獲得土地使用的權利。此外，居民還應該要得適當賠償，因為，他們的祖傳土地被強硬徵收去建造的太陽能發電廠。「Soulaliyate women」指的是生活在摩洛哥集體土地上的部落婦女。而 Soulaliyate 婦女運動始於 2000 年代初，是源於對部落的集體土地被大量商品化和私有化之事件。部落婦女要求在其土地私有化或分割時享有平等的權利和份額。然而，這運動卻受到政府當局百般恐嚇，甚至逮捕圍攻群眾。有幸這場與高舉平等和正義旗幟的運動在來自不同地區的婦女團結和努力對外之下，已蔓延至全國各地。

只是，儘管這些問題和不公正現象真實存在。但在君主政體、鎮壓政權及其宣傳工具的保護下，此計畫仍如火如荼地持續進行。這種將社會生態成本外部化，並將其的空間和時間上轉移的邏輯其實即是資本主義榨取的驅動力。更難過的是，這樣的邏輯似乎並沒有終結的跡象。

### > 西撒哈拉的綠色殖民主義與佔領

摩洛哥的瓦爾扎扎特的太陽能發電廠和 Noor Midelt 等計畫，被稱為「綠色掠奪」，亦即為了所謂的環保目的而侵占土地和資源。無獨有偶，在西撒哈拉被佔領土地上所進行的類似再生能源（太陽能和風能）的計畫，則被貼上了「綠色殖民主義」的標籤，因為這些計畫不顧當地住民的反對，直接掠奪與佔領他們的土地來實施計畫。

綠色殖民主義可以被定義為將掠奪和剝奪（以及對他人的非人性化）的殖民關係。而此項議題也可以延伸到再生能源的綠色時代，事實上，這只是將負面的社會環境成本轉移到週邊國家和社區。與過往相同，全球能源密集生產和消費維持相同模式，而這樣的模式一樣會造成不平等、貧窮和剝奪；這樣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也從未改變。唯一有變化的只是能源來源不同，由化石燃料轉向綠色能源。

目前，被佔領的西撒哈拉地區有三個運作中的風力發電場，而第四個風力發電場正在波哈多角建設中，此外，另有幾個風力發電場在規劃階段。這些風力發電場的總裝置容量超過 1000 兆瓦，有部分由摩洛哥王室控股的公司 Nareva 投資組合。摩洛哥國營磷酸鹽公司 OCP 開採西撒哈拉布克拉不可再生磷酸鹽儲量所需的能源中，約 95% 由風車產生。例如 50 兆瓦的 Fom el Oued 發電廠配備 22 台西門子歌美颯 (Siemens) 的風力渦輪機。這些渦輪機自 2013 年開始運作，為再生能源生產做出不少貢獻。

2016 年 11 月 聯合國氣候談判 COP22 的期間，沙烏地阿拉伯的 ACWA 電力公司與 MASEN 簽署了一項協議：未來他們將計劃開發一個綜合的太陽能能源項目。此項目會由三個光伏太陽能電站組成，總裝置容量達到 170 兆瓦。然而，令人擔憂的是其中兩座電站（目前已投入運營，總計 100 兆瓦）並非位於摩洛哥國內，而是位於被佔領的土地上（分別是 El Aaiún 和 Boujdour）。此外，也此計劃也預計在達克拉 (Dakhla) 附近的 El Argoub 建立第三座太陽能發電廠。這些再生能源項目，似乎受到外國資金和私人公司的共謀，深化了摩洛哥與被佔領領土之間關聯性，且加強了侵佔居民土地的狀況。

上述背景下，我們急需深刻審視再生能源過渡，並注意「乾淨」、「可持續」和「碳排放減少」等表層宣傳口號以外的議題。將化石燃料從可再生能源過渡，且無論任何形式可再生能源的實施與轉變都值得鼓勵這件事，以及將是所有項目和圍繞它們的炒作合在一起討論，絕對是個嚴重的誤解。我們必須明確指出：當前的氣候危機不是由化石燃料本身引起的，而是因為化石燃料被用於供養資本主義。並且，這種使用方式是不可持續且破壞性的。因此，實現綠色和公正的轉型需要根本性地改變全球經濟體系，使綠色能源非殖民化。因為事實上，這樣的資本主義體系在社會、生態和生物層面都不符合我們當前的需求。■

來信寄至：

Hamza Hamouchène

<[hamza.hamouchene@gmail.com](mailto:hamza.hamouchene@gmail.com)>

Twitter: [@BenToumert](https://twitter.com/BenToumert)

# > 非洲的綠色與內部殖民主義

Nnimmo Bassey, Health of Mother Earth Foundation, 奈及利亞



35

非洲的採礦業。來源：iStock, Africanway, 2012。

**綠**色殖民主義是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殖民主義的延伸和融合，其深層扎根被鞏固於[殖民主義的遺毒](#)下。這種形式的殖民主義在非洲生根，塑造了當地領導人對國際遺產保護體系的信仰。這些領導人以此概念為基礎推廣綠能，但實際上卻是為了謀取自身利益。殖民主義的概念中除了對於有形的殖民地的保護之外，也灌輸當地菁英一種觀念：以國內天然資源和勞動力，對外招募外國經濟體的投資以換取現金、使當地經濟活絡。新殖民主義的國家即採用此模式，尋求願意讓外國投資的地區，並對此國家剝削勞工和自然資源。並且，他們以早已設置好的外匯匯率，在不經討論的狀況下自行決定購買勞動力與自然資源之金額價值。

>>

由殖民地的農業生產將糧食生產轉向了經濟作物的這個面相，可以窺見當地陷入外匯絕境的例子。如此的產業轉型，延續了殖民時代的奴隸制下之剝削性農業體系。直至今日，種植農業仍生產出口作物，這樣的土地掠奪剝奪了農民替社區生產糧食的可能性。更複雜的是，除了為外部市場提供食品，農業用地和單一作物現在也被供給成為生質燃料或生物能源的材料來源。無論是農業、礦業或化石燃料領域，非洲的國家領導人追求卻只是外匯，然而外匯的匯率卻非由他們制定。

殖民主義和後殖民時代建立的結構大大改變了非洲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動態。殖民主義在這片土地播下了尋租的種子，而國際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則澆灌了這些種子。債務也成為一種工具，改變了各國發展的想法，並迫使各國更放寬寬限，也加劇了殖民母國資源掠奪的程度。各國政府被迫還債，以滿足進口需求，並鬆綁跨國公司的入國注資的經濟條件，其中包括：稅收減免、勞動力配額以及將其交易中的所有利潤匯回殖民母國的自由等等。此外，被殖民國也與這些外資公司建立了不對等的夥伴關係，導致他們無法實施嚴格的監管。如前所述，政府的不情願和無力管控公司的總總行為都已經導致了對生態的破壞性開發，在一些被開發的地區導致了死區的出現。

自由貿易區或特別經濟區的建立，事實上也有助於鞏固他國的自由剝削。其中，出口加工區是自由貿易區的一種類型，發展中國家政府經常為了促進工商業出口而設立。許多國家認為這樣的政策，對吸引外國投資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報告，38個非洲國家設立了超過200個經濟特區。此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也指出，至少還有 56個經濟特區正在建設中，而其他的則仍處於早期開發階段。據了解，[非洲已用於經濟特區的 land 面積](#)達約15萬公頃，同時已吸引了超過26億美元的投資，主要聚集於農產品加工、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榨取外匯的制度是一種無止盡、只會為人類或地球帶來負面價值的消耗故事。自圓其說的人權原則和實際上不透明的倡議活動，只是在幫助企業為其公司計畫透過綠色能源等公司政策價值洗白，實際上，這些公司聯盟且透過腐敗的政客輸出了更多對於人類價值和地球永續毫無幫助的污垢。Frantz Fanon 在其經典著作《[地球的悲哀](#)》中早預見到這樣不幸的局面。他指出，殖民主義的目的是讓人們看到其開採和出口的自然資源，從而滿足母國工業的需求；殖民地的特定地區變得相對富裕，只是微不足道的附帶紅利。然而，殖民地的其他地區卻走上了不發

達和貧窮的道路，或者說，更加深陷於不發達和貧窮之中(第106頁)。

Fanon 看見殖民結構如何分裂國家、擴大主體性，阻礙了非洲的團結。他說明這些國家的政治菁英將自身視為國家機會的創造者，將殖民母國在本國的進駐視為進步的動力。這也就解釋了為何現任領導人如此固執地堅守開採化石燃料和其他礦產以獲取出口／現金的立場，因為，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一種無法協商退讓的權利。因此，如此的情形也說明，國內的生態滅絕必須被接受，就猶如不打破雞蛋就做出歐姆蛋。

然而，我呼籲貪婪開採、發展土地的行為，需被徹底地反思與審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透過其惡名昭彰的結構調整計劃，強行削減包括醫療、教育和經濟支持在內的社會服務的資金，這種殖民方式操縱顛覆了常理、逆轉了進步、製造了貧困並深化了不發達地區所遇的困境。這些機構的負面影響突顯了，我們有必要從生態社會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角度密切關注權力的不平等。

### > 化石燃料爭奪戰

在爭奪石油和天然氣的過程中，各個非洲國家的領導人只看到了本國從快速發展項目，從而迅速獲益的機會。他們的論點是擴大生產將增加人民獲得能源的機會，然而這是一種虛偽的說法，因為[數十年的開採](#)只帶來了生態破壞和更多的貧窮。

固守殖民體系下的貿易系統被稱為「巫毒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這樣體系下，現金透過少量的發展與原料的轉化流入本國，促使非洲國家極度依賴租借主義，亦即透過跨國公司取得國家收入，並且，這樣的發展也同時促使對殖民母國依賴的根深蒂固。毫不意外地，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加彭、查德、安哥拉和剛果共和國，[石油收入](#)皆至少佔國內生產毛額 20%。除此之外，儘管石油和天然氣僅佔奈及利亞實際 GDP 的6%，但卻佔外匯收入的95%、政府收入的 80%。非洲聯盟國家集團利用 2022 年在沙姆沙伊赫舉行的 COP27 氣候談判，[遊說擴大化石燃料的生產](#)，以便像富裕國家一樣從豐富的自然資源中獲益。然而，他們的論點缺乏對外匯撥款和外部企業體制的批判性審查，而正是這些機制使富裕國家得以從資源中大量獲益。

非洲資源掠奪的根源與殖民主義緊密相連。因為殖民主義奠定了免於對外、對內追究責任的基礎，使人們不必擔心受到懲罰。掠奪和免責現象日益猖獗，有時甚至伴隨著殘暴的武力。這致使非洲的自然

>>

資源豐富和衝突的地域幾乎完全重疊。開發活動通常受到國家軍隊、安全人員和僱傭軍的支持，實際上是在軍事護盾的掩護下進行；他們對人權和集體權利是漠視不顧的。

政治生態學家 [Patrick Bond](#) 以法國、南非和盧安達的行動描述了在全球暖化背景下，這些國家無止盡地進行石化燃料開採的不安局勢。他指出：「目前法國國家權力對於非洲此產業的發展，仍是遵循著傳統模式在背後操作發展。他們透過石化燃料的開採，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府、社會和環境造成侵蝕。」而為了支持此觀點，他提到了「2021年，艾曼紐·馬克宏（法國總統）在盧安達和南非軍隊的協助下，堅決採取軍事干預行動以維護 Total 企業在莫三比克共和國價值 200 億美元的天然氣。此外，普利托利亞（Pretoria）的次帝國主義角色同樣解釋了為何自 2010 年中期以來，法國不遺餘力地支持與 Total 企業結盟的新石油大亨，以開採大量天然氣儲備，並透過地震爆破技術尋找新礦藏。」

Bond 繼續指出，自2021年以來出現了兩種反抗石化帝國主義和次帝國主義復興的力量。首先，暴力衝突動搖了法國石油和天然氣巨擘 Total 公司的政策；另一種是聚集於南非海岸線的環境和社會動員，令該國政府深感震驚。

法國作為一個對非洲法語國家保持嚴格殖民控制的國家，其所扮演的角色難以令人忽視。儘管法國已經在其領土上禁止使用壓裂技術以及原油開採，同時也禁止石化燃料廣告。但是，他們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能源公司仍持續在其他地方開採。其中最惡名昭彰的事件是莫三比克共和國的德爾杜加角省，在COP27會議在沙姆沙伊赫舉行時，第一批化石天然氣就是從這裡運出的。[第一批](#)化石天然氣的運輸時間和開會時間重疊的事件表明，事實上，暴力並沒有阻止非洲資源的開採。賴比瑞亞的「血腥鑽石」事件、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持續動盪就是最好的例證。

Total Energies 是德爾杜加角最重要的天然氣開採商之一。Afungi 的液化天然氣 (LNG) 園區是專為化石燃料業務而建。而為了修建通往園區的長達 70 公里的道路，超過 550 個家庭被迫搬遷。那些沿海捕魚社區被遷移到距離海洋有超過10公里的「重置村落」，被迫切斷了他們與海洋的聯繫，甚至剝奪了他們的農田、漁場、生計來源、文化傳承以及對沿海社區至關重要的一切。德爾杜加角擁有非洲大陸[最大的三個液化天然氣項目](#)：莫三比克液化天然氣項目 (Total Energies 公司，前身為 Anadarko 公司) 價值200億美元、珊瑚液化天然氣 (Coral FLNG) 項目 (埃尼公司和 ExxonMobil 公司) 價值47億美元、馬布多液化天然氣計畫 (ExxonMobil 公司、埃尼公司和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價值300億美元。德爾杜加角可能是非洲大陸上最嚴重的企業災難之一。

馬布多 2022 年 11 月，環境正義組織主持了一場關於企業不受制裁問題的會議，參與者包括來自莫三比克各地的 100 多名成員。會議期間，一位社區代表痛苦地表示：「對我們而言，跨國公司不是帶來了發展，而是帶來了恥辱。用「殖民主義」取代「跨國公司」，就能將這個剝削的圖像變得更加完整且被看見」。另一位與會代表也提問：「破壞我們的土地，還能稱為發展嗎？」他接著又反問：「難不成這就是我們所期望的發展嗎？」

殖民主義，他們對人民和土地的不尊重是根深蒂固的；無論其表現為何，黑色、藍色又或是綠色？他們都從未與人民協商。在這樣的遊戲中，Total 石油天然氣公司開展業務的地區都經歷了社會不平等的惡化和社會的分裂。諷刺的是，唯一的共通之處大概就是這些地區通常皆被稱為「Total 地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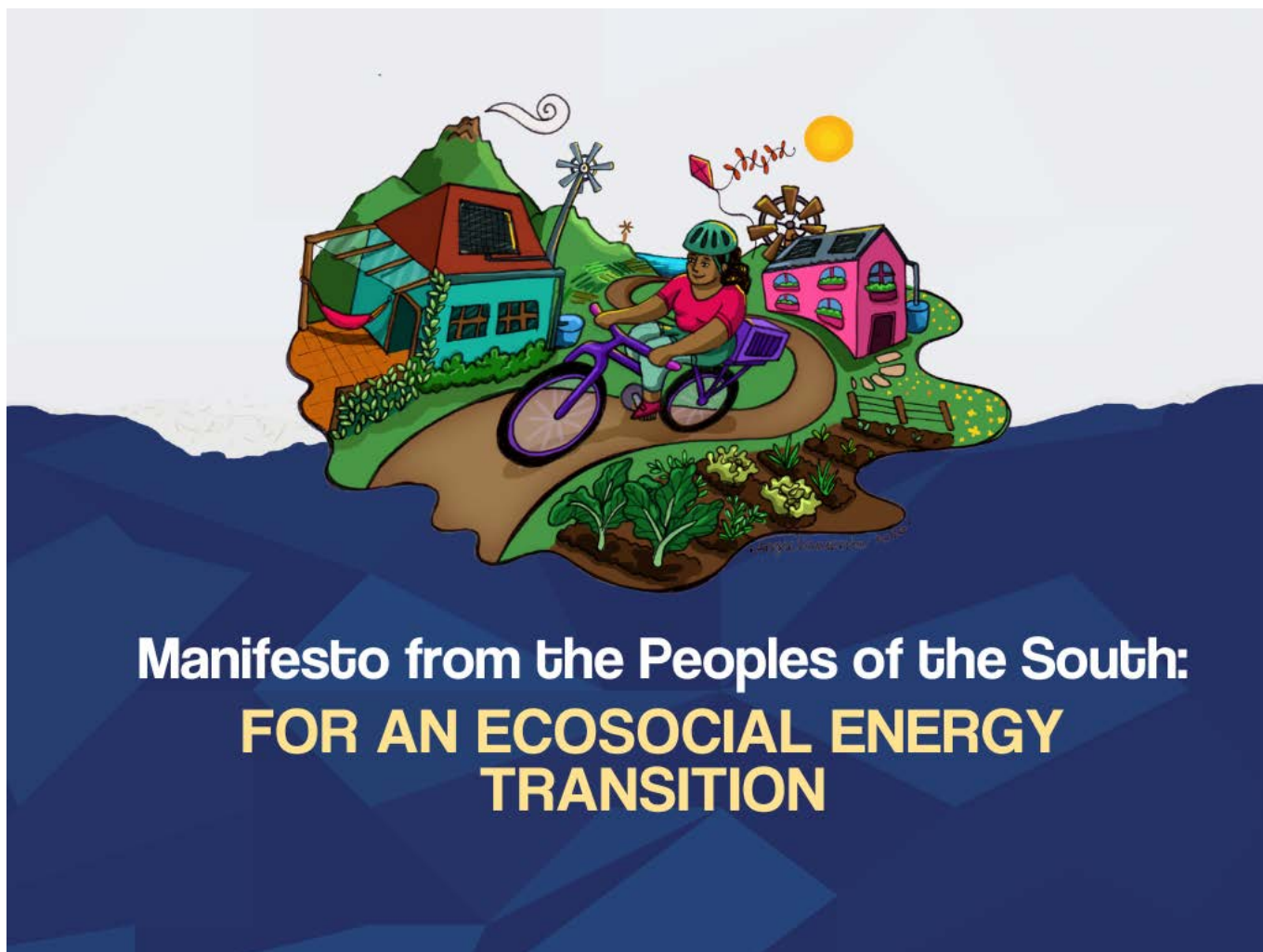
來信寄至：

Nnimmo Bassey

<[home@homef.org](mailto:home@homef.org)>

Twitter: [@NnimmoB](#)

# > 南南合作：促進生態社會 能源轉型之宣言\*



Manifesto from the Peoples of the South:  
FOR AN ECOSOCIAL ENERGY  
TRANSITION

來源：Pacto Ecosocial e Intercultural del Sur。

**經**過新冠疫情在全球兩年多來的大流行，再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狀況，全球正進入一種「新常態」的狀態。這個全球狀況反映出各種危機的升溫，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生態、生物醫學和地緣政治等危機。

此外，環境問題日益嚴重、日常生活甚至呈現了軍事化的特質。全球許多人獲得高品質食品、乾淨用水以及可負荷的醫療保健的狀況更加艱難。越來越多的政府走向獨裁統治的趨勢。富人與特權階級愈益富有、強大，而未受監管的新技術只會進一步推動這種不平等的趨勢。

而不公平狀態的根源——資本主義、父權體制、殖民主義以及各種基本極端主義——都加劇了目前

>>

全球的不平等困境。因此，我們迫切需要討論和實施新的生態社會轉型和變革，並且，這些願景應該具備性別平等、永續性以及普遍性的特徵。

## > 我們的診斷

在這份《南方人民宣言》中，我們認為全球南方面臨的問題，與全球北方以及崛起之大國（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並不相同。這兩個領域之間的權力不平衡不僅受長期受殖民遺毒影響，還因新殖民主義的能源模式而愈加嚴重。在氣候變遷加劇、能源需求不斷增長以及生物多樣性喪失的背景下，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繼續擴大對邊緣國家在自然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方面的掠奪。眾所周知的採礦模式不僅持續存在，北方地區對於南方的生態剝奪債也不斷增加。

最新近況，全球北方正在進行所謂的「乾淨能源之轉型」，而不幸地這只給全球南方帶來了更大的壓力。他們被迫生產鈷和鋰以用於製造高科技電池；他們不斷伐木以製造風力渦輪機；他們開發土地以建造大型太陽能電池陣列，並建造新的基礎設施以支持氫氣大型計畫。我們會發現，這種市場驅動富裕國家的去碳化策略，在產業依賴全球南部的狀況下，卻反而成為新一輪環境掠奪，並對數百萬婦女、男子和兒童的生計一直到產生非人類生命皆產生了了劇烈影響。在這樣的狀況下，全球南方再次成為犧牲區，猶如成為全球北方國家取之不盡、用之不盡的資源百寶袋。

事實上，全球北方的優先事項是確保全球供應鏈，尤其是關鍵原材料的供應，同時他們還必須慎防某些國家（如中國）壟斷他們的供應鏈。舉例來說，最近七國集團（G7）貿易部長呼籲透過國際合作、政策和金融措施，包括透過世界貿易組織推動環境產品和服務貿易，以建立負責任、可持續和透明的關鍵礦產供應鏈。此外，全球北方正積極推動與全球南方簽署更多的貿易和投資協定，以滿足其對資源的需求，特別是「乾淨能源之轉型」所不能或缺之資源。然而，這些旨在減少貿易和投資障礙的協定，可能透過投資者與國家爭端解決機制（ISDS）使國家面臨法律訴訟風險，從而保護和加強了企業的權力和權益。全球北方正是利用這些協議來控制「乾淨能源之轉型」，進一步鞏固了新的殖民主義。

與此同時，南方國家的政府陷入債務陷阱，不得不借款用於建設工業設施和發展大規模農業以滿足北方的需求。為了償還這些債務，政府必須不斷開採更多的資源，形成了一個不斷加深的深不平等惡性循環。目前，雖然減少北方的消費並非輕而易舉之事，但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依賴，因為，這只會增深對自然資源的壓力。此外，儘管全

球在推動能源轉型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北方仍然未能承擔起解決其歷史上欠南方，以及他們不斷積累的生態債務的實質責任，而這種責任往往只說說而已。

僅僅改變能源結構是不夠的。從生產、分配到消費和浪費，整個能源系統都必須經歷徹底的變革。單純地使用電動車取代內燃引擎車是遠不夠的，因為我們需要重新構思整個交通模式，以降低能源消耗，推廣永續的選擇。此外，我們不僅需要改善核心和邊陲國家之間的關係，還需要改善國家內部、菁英和公眾之間的關係，使制度與資源分配更加公平。全球南部國家存在腐敗的精英特權階層，他們透過從資源開採中獲益，並製造了不公正的制度、資源分配以及加劇了經濟的不平等，也同時踐踏人權和環境保護。為了應對這些錯綜複雜的挑戰，單純依賴技術還不夠，政治方面也是我們必須迫切處理的層面。

## > 全球南方的轉型正義

作為來自全球南方不同國家的活動家、知識分子和組織，我們呼籲全球各地的推動轉型的運動者全身心地致力於基進、民主、性別公正、再生和基層導向的生態社會轉型，並且改變能源部門以及依賴大規模能源投入的工業和農業領域。正如氣候正義運動中所提及的「轉型是無可避免的，但正義並非如此」。

截至目前，我們尚有時間開始邁向公正和民主的轉型。我們可以擺脫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邁向維護生命，將社會正義與環境正義融為一體；更甚，將平等、民主的價值觀與靈活、全面的社會政策相互結合；最後，恢復地球所需的生態平衡之方向前進。但若實現此目標，我們需要更豐富的政治想像力來建構一個公正、尊重我們共同家園的烏托邦式理想社會。

能源轉型應成為綜合願景的一部分，以解決能源資源分配極不平等的問題，從而促進能源民主。它不應該過度強調大型機構，如：企業農業和大型能源公司，或是基於商業市場的解決方案；相反，它應該積極強化民間社會和社會組織的韌性。

## > 聲明要點

由此，我們提出以下八點建議：

1. 由全球北方企業主導的並受到全球南方眾多政府所接受的能源轉型計畫，必然會擴大犧牲全球南方更多的區域。能源轉型計畫使殖民主義遺毒、父權體

>>

制和債務陷阱持續存在。我們呼籲，能源是不可剝奪的基本人權，能源民主應成為我們共同努力的目標。

2.此外，我們也呼籲全球南方國家的人民，應拒絕以新形式能源「綠色轉型」為名的新殖民主義。因為，它從來不是能解決能源問題的方案。我們特別呼籲南方各國人民繼續與政府和企業進行政治協調，且與身在北方的批判團體共同結盟對抗不義。

3.為了減輕氣候危機造成的破壞、促進公正和大眾化的生態社會轉型，我們要求北方國家償還對南方的生態債務。有鑑於全球北方對氣候危機和環境崩潰所需要承擔的不成比例的責任，這意指或許我們需重新思考給予全球南方的賠償制度。我們建議，這項制度應囊括資金和適當技術的轉讓，並考慮取消全球南方國家的主權債務問題。我們再次呼籲：北方國家應該對於當地原住民、弱勢群體和社區因採礦、大型水壩和骯髒能源項目等遭受的損失進行賠償。

4.我們反對本國透過水力壓裂法通過擴張碳氫化合物的使用。此外，歐盟最近竟然宣布天然氣和核能為「乾淨能源」，我們同樣極力反對歐盟這種虛偽的言辭。這樣的立場在今天得到了許多社會部門和組織的支持，正如厄瓜多爾在 2007 年的「亞蘇尼倡議」中已經提出的論點。我們主張將石化燃料留在地下，同時創造必要的社會和勞動條件、摒棄榨取主義，走向屬於後石化燃料時代。

5.我們同樣反對「綠色殖民主義」的土地掠奪。並且，它因建設太陽能 and 風能發電場、濫採關鍵礦產，以及推廣藍氫、綠氫和灰氫等技術的「偽解方」去封閉、排斥、暴力、侵占和固化南方國家。而這樣的狀況從過去到現在不曾改變，已成為南北能源關係之特徵；對此，我們再次強調：南方國家所面臨的剝削和困境，在生態社會轉型的時代不再可被接受。

6.我們要求真正地保護這些環境和人權的捍衛者，特別是一直站在抵制榨取主義的最前線的當地原住民與婦女族群。

7.我們的基本目標包括，社區應該自立擁有和經營替代性、分散式、公平分配的可再生能源計畫。如此一來，則得以消除全球南方和北方部分國家在能源問題上的不足。

8.最後，我們公開譴責那些希望榨取和開採更多位於邊陲國家的石化燃料之國際貿易協定。我們必須終止由跨國公司控制的貿易和投資協議，因為這些協議最終會促進更多的開發，強化新殖民主義。

我們的生態社會替代方案建立在無數掙扎、努力、策略、建議和社區倡議的基礎上。我們的宣言與原住民的生活經驗、批判性觀點以及全球南部的其他地方社區、婦女和青年相聯繫。其靈感源於自然權利(buen vivir、vivir sabroso、sumac kawsay、ubuntu、swaraj)，以及公有領域(the commons)、關懷經濟(care economy)、生態農業(agroecology)、糧食主權(food sovereignty)、後採掘主義(post-extractivism)、多元(the pluriverse)、自治(autonomy)和能源主權(energy sovereignty)。最重要的是，我們呼籲實現基進、民主、普遍、性別正義、可再生和具全面性的生態社會轉型。

跟隨 [Ecosocial and Intercultural Pact of the South](#) 的腳步，本宣言提出了一個不斷發展、且活躍的平台，邀請您加入我們共同為這些理想奮鬥、幫助我們創造集體理想願景與解決問題之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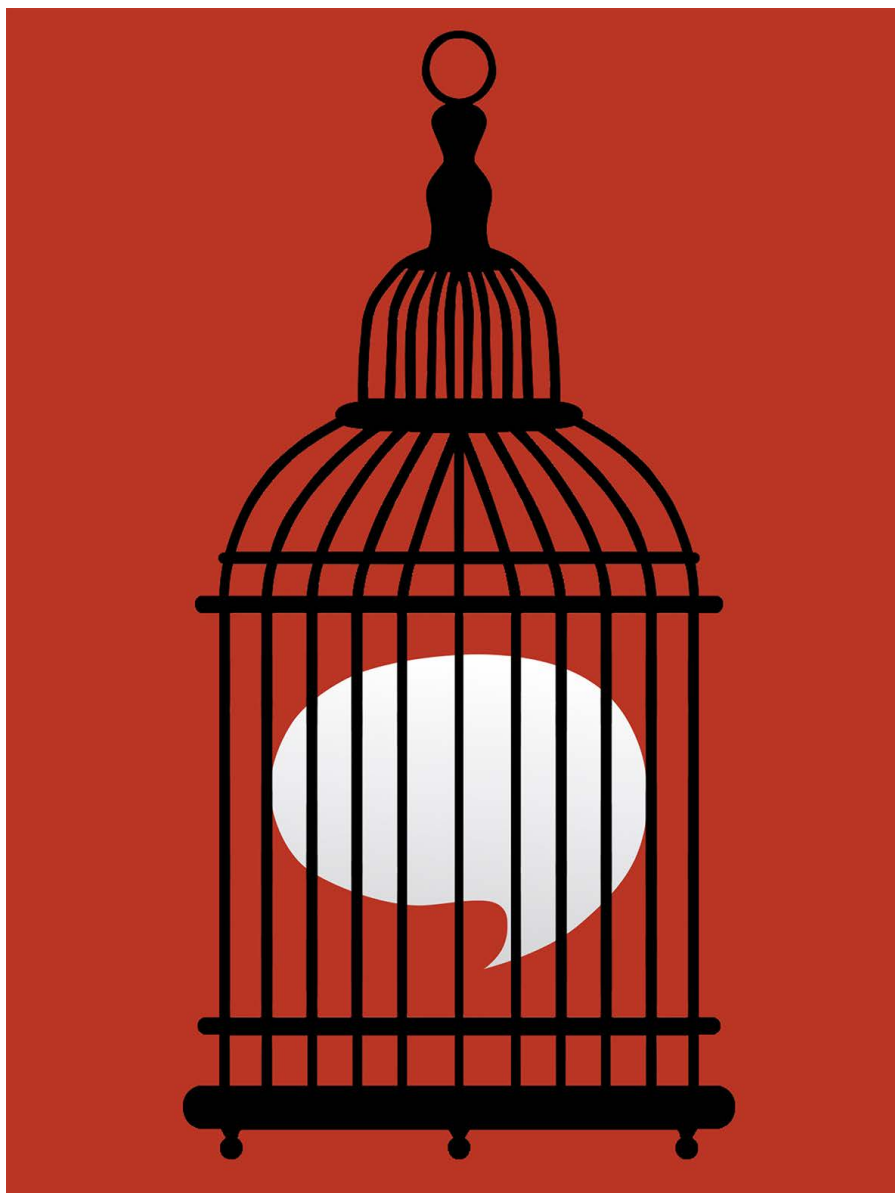
\* 這份《Manifesto of Peoples of the South》歷經一年的書寫時間，由來自全球南方(拉丁美洲、非洲和亞洲)的社會運動者、知識分子和組織在多次對話和討論後所共同撰寫。



# > 革新威權(與威權主義)理論的必要

Kathya Araujo, Universidad de Santiago de Chile, ISA社會學理論研究委員會(RC16) 成員

來源: [Freepik](#)



**威**權——以及如何行使威權——是如今極為熱門且迫切的議題。這個議題涉及諸多領域，包含：威權主義政權的社會支持、威權主義自身、教師如何在校園中施展權力時陷入困難、都市空間的管理困境，以及家庭關係緊張等等。有鑒於近來的社會與政治現象，以及其隱含的風險與急迫性，我們應該要善用社會學精細的視野，藉由適當的工具來處理這項議題。至今以來，以威權行使為主題的社會學研究並不多，因此，革新威權的理論概念頗為必要。

早在許久之前，威權這個主題就已經是社會理論界的焦點，而這方面最具影響力的學者當屬韋伯。他指出，威權背後的基礎，是對於正當性的信念——這對於後續的社會理論和實證研究皆有深遠影響。然而，我並不認為我們應該要繼續以這種理解為尊。原因有兩點：首先，威權由正當性而生的理論，只能部分地反映當今的社會現象；其次，這項理論只能解釋某些社會現實中的特定威權行使。

>>

我們先談談第一個原因，即這項理論於當今社會的適用範圍。我們知道，韋伯認為，威權的核心驅動力，是對於指揮或行使權力之正當性的信念。而這樣的信念，使得權力行使能夠得到共識，也是權力穩定和持久的基礎。韋伯認為階層制度是穩定、相對持久的，且威權的行使在某種程度上是具有制度、傳統或普遍價值觀支持的。這種威權具有下列特點：a) 與階層制度的穩定與持久緊密連結；b) 服從是立基於自我與命令之間的穩定關係；c) 以群體間（如男性相較於女性、成人相較於兒童等）相對穩定的權力關係為基礎；d) 主要以個體關係的形式施展；e) 受到社群成員間的中介物，以及社群成員與世間萬物間的中介物支持。

### > 挑戰經典威權理論模型

有一些開創性的思潮，對於這項理論模型提出了挑戰，也深深地影響了人們如何理解階層與威權。我將簡要提及其中五個思潮。

第一股思潮與道德秩序、信仰和價值的多元化有關；其使得共同、普遍的信念受到削減，理論中所提及的、威權背後的支持基礎也隨之減弱。

第二股思潮，則是持續擴展、深化平等與自治的規範性原則。這項進程的結果之一，是人們對於階層制度及其穩定性與持久性——即韋伯理論中的解釋性假設——產生了更多質疑。

第三，是個體化的程度日漸提升，人們越來越不願意屈從於他人的意志。強調個體獨特性的風潮，與個體之間相互服從有著明顯矛盾。因此，自我與命令之間的關係不再，正當性的理論基礎也隨之動搖。

第四，群體間的權力分配變化，也衝擊了傳統階層結構及其管理手段，例如父權威權模式。這同樣削弱了階層制度背後的支持力量，使得衝突和爭議更加劇烈。

第五股潮流與科技發展有關。科技發展促使事實性的威權原則出現，關係性的威權原則於是受到挑戰。於是，韋伯於其理論中有關關係性的假設，與現實之間出現了些許落差，醫生或教師等權威人物的中介作用，也因這項原則的出現而遭受質疑。

簡而言之，這些新的思潮使得我們對於威權有了新的認知，也動搖了韋伯理論的諸多前提。

### > 重新檢視以正當性為基礎的威權理論

我們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檢視這項理論，以及上述潮流帶來的社會歷史變遷，所引發的挑戰。透過[智利的個案研究](#)，我發現行使威權的方式不只一種；而不是每種方式都符合正當性威權理論的解釋。

一直以來，智利的威權行使較少如韋伯說的那樣，存在有共識的服從；更不涉及正當化——即強化正當性信念——的現象。大多時候，威權的基礎反而是由威權行使人藉由向他人證明自身有能力使人服從，來策略性地使人服從。換句話說，威權是否得以存續，得看威權行使人的行為能否展現效果。

這樣的案例，很少能達成人們自發地認同於威權的狀態，也因此，服從經常不是自發的，而只是策略評估後的務實選擇，且是以行動者的互動能力為基礎。這與韋伯的觀點相反——對他來說，利益不可能成為正當性信念的基礎，也因而不可能是威權的根基。

在智利，這種行之有年的威權行使方式，往往會造成不穩定和脆弱的權力關係，而這會導致「強勢威權」更常出現。人們相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威權行使是有效的。韋伯的正當性理論中，威權的行使是以掩蓋其背後涉及的力量為目的；而這種威權行使與之相反，反而會藉由演講、肢體語言等方式，強調威權行使人的強勢。

這種獨特的威權運作方式在歷史上常見於垂直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階層體系是僵化且自然不變的。這種模式與如今常見的新興民主威權模式、正當性信念的威權模式都相距甚遠。不過它仍然存在於許多社會當中，且被認為是能確保人們服從的唯一方法。

基於前述的研究發現，我認為，依據社會現實之間的差異，以及其應對成員權力不均衡的方式，威權行使發展出了不同的模式。我們不該把這些威權模式視為偏離規範，而應將其視為在特定歷史情境中的不同方案。在分析他們時，必須考量每個社會的結構因素、動態與社會邏輯。

### > 互動且處境化的威權行使理論取徑

我於上述呈現了正當性威權理論在兩個面向中受到的局限，並在此呼籲：我們的威權理論，以及其

概念與方法論，是時候要更新了。經過一系列實證研究中的發展與測試，我提議從互動和關係取徑出發。

首先，這種取徑傾向將威權視為許多社會機制（如禮貌、文明、社交等）的其中之一，用於管理社會生活，並確保社會維持權力均衡。藉此，我們能夠擺脫過去社會理論中的二分法，其僅僅將威權視為整合機制，或是純粹的支配工具。

其次，我們應破除階層概念與階層秩序間的緊密連結，不再將階層視為具有持久性、永恆性與僵化性。這種理解方式，使我們難以在更具流動性、權力分配以橫向為主、威權位置輪替更常見的社會中，理解權力均衡機制。與之相反，此一取徑強調把階層視為模糊、邊界不明確，且動態。

第三，我們應該將視野從威權根基、服從理由、純粹代表等領域上移開。在當今的社會，探討威權的基礎，以及人們如何基於規範性共識而行動，已經不足以解釋威權。這套新取徑的分析重點，將是威權如何被行使，並理解其在不同情境中如何交替、轉變並展現多樣性。

第四，不再如過去那樣，藉由韋伯的「理型」概念，將威權視為某種具有同值性的事物。這套取徑將威權理解為具有特定結構和歷史背景，是特定社會情境所發展出的最佳方案。在不同的歷史時刻、社會領域（家庭、政治、工作等）、社會位置中，威權的行使都有不同的脈絡。

總之，我們急需更新威權的理論工具。正如我的實證和理論研究所呈現，我們需要從以「正當性信念」為基礎的方法，轉向互動且處境化的威權理論取徑，才能更好地解釋，當今的社會行動者如何在不同社會中，面對權力不均衡的現象。■

來信寄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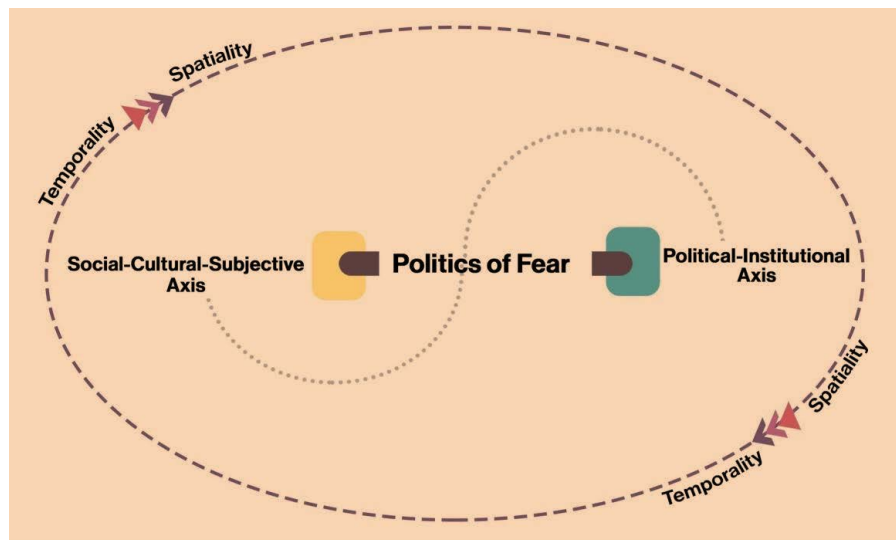
Kathya Araujo

<[kathya.araujo@usach.cl](mailto:kathya.araujo@usach.cl)>

/ Twitter: [@AraujoKathya](https://twitter.com/AraujoKathya)

# > 「恐懼政治」與威權政治想像

Lara Sartorio Gonçalves · IESP-UERJ · 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 · 巴西



作者作的圖片，旨在說明恐懼政治的矛盾性質，其糾結於時間與空間的交混，促成了恐懼政治的另外兩個重要面向：政治—制度與社會—文化—主體。

**恐**懼是過去十年中最經常被提及的詞彙之一。我所指的是多重面向的恐懼，諸如：面對城市暴力(urban violence)的恐懼、面對身體遭受暴力對待的恐懼、面對國家暴力的恐懼、面對社會不公義的恐懼、面對未來的恐懼，甚至是面對存在的恐懼。在全球衰退緊迫襲來之際，人們的反應結合生存本能，使恐懼成為觀察政治行為和社會連帶結構的指標。我所說的「恐懼政治(politics of fear)」包含許多面向，不只是近期出現的現象(在全球崛起的極右翼及其將恐懼工具化中可以清楚見得)。以一個更全面的角度來看，我們正在目睹極右政治團體的能動性——例如我所研究的巴西博爾索納主義(Bolsonarism)，也看到一種社會趨勢，那是更能接受獨裁政治想像和恐懼其穩定的社會歷史存在。

## > 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

我認為，應該要透過「裂隙實踐(practice of fissures)」的觀點，來理解恐懼政治。這套觀點不會避談因不同元素而產生的變動、折疊與糾纏，且能夠適切地關注那些不止於精神，也於肌肉、血液、脈搏中重複被言說、經驗、累積的多重性。若是將恐懼政治圖像化，那麼它應該會具有某種流動的、可變動的形狀；組成恐懼政治的各個元素之間充滿了孔隙，但又

不是完全分離。只有在人們試圖分析、教學時，這個概念才會被切割開來理解。必須注意的是，即便是機構、個體、集體或是企業這類行動者，也未必會被視為是連續或單一的。廣義來說，恐懼政治指的是一套有機或人造恐懼轉化為社會凝聚力的機制，於現代政治中發揮重要功能。

恐懼的瀰漫是一種政治效應，其不只作為構成社會紐帶的動態媒介，也正當化了社會排除與仇恨。恐懼政治的矛盾修辭——例如記憶、美學、建築、軍事化的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及隨之而成的社會深淵、數位化與加速的時間、邊界經驗和恐懼的地理位置、殖民和都市暴力——糾纏於時間、空間的交織之間。

恐懼的經驗，會因權力的幾何而異；這與構成恐懼和共同敵人矩陣的三元素有關，即種族、性別、階級。舉例來說，在巴西貧民區，國家會藉警察之手施行暴力，而在都市中，軍隊則通常會帶來某種安全感；因此，相較於都市，生活於前者這類地區的人，對身穿制服者所懷抱的恐懼明顯更大。

恐懼政治的裂隙之中，存在著政治—制度以及社會—文化—主體兩個軸心。前者對應著國家與文明間，以秩序／混亂的二元對立為基礎的潛在殖民關係；其對「暴力的壟斷(monopoly of violence)」以

及「國家保護社會的責任」等概念來說極為重要，左右著人們如何定義正當的、合理的權威，也決定了道德、世俗與政治企業家精神的意涵。後者則與前者處於同一時空，且兩者的關係極為緊密；其是由推崇特定邏輯的認知與政治觀點所構成，包括：危險他者的邏輯——這使得能夠守護人民的國家成為必要，並促成了敵意政治與政治兩極化等現象；數位化中監控技術的應用，以及某種限制自由的意願；具有高度媒體再現性的、恐懼與暴力的美學生產。

呈現恐懼政治的概念輪廓，讓我們得以更全面地反思極右派的崛起，以及民眾對威權主義的追隨。這套研究取徑關注極右派如何出現、持續存在、其激進主義與追隨者如何變動，並藉此理解這些現象可能帶來何種後果。我們應該將這些事件視作社會政治的里程碑，而不只是事件本身。反思公共生活與政治經驗如何產生並調動特定事件帶來的效應，將為社會的堅實提供有效支持。受 [Kathya Araujo](#) 的啟發，我已經找出了一些錨定社會存在的基本元素，要理解極右思想的當代吸引力，這些元素是極為關鍵的。

### > 威權主義的社會存在錨點

威權與其有效性之間的關係，被殖民地國家的集體想象所鞏固，且是專制主義的同化基礎。將他者轉化為罪犯，是一種經常出現在歷史上的動態過程，從國家的種族結構、以武力和暴力統治領土的手段、區分殖民和被殖民者的主觀標記，就能觀察到這點。從巴西的歷史當中，我們可以明確地看到威權的有效性基礎，是如何建立於鎮壓奴隸起義之上。我們必須得承認這種普遍的恐懼是社會關係的根本，才能夠更好地思考當威權與威權主義如何以不同形式運作或潛藏於民主之下。威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相容性，更反映了威權實踐的擴展如何普遍；我們能在生活的不同範疇——無論是最為個人、私密的，還是更宏觀的社會關係——當中看見威權。

正如 Vladimir Safatle 所言，於自我與他者形象的建構過程，以及都市空間的領土動態中，恐懼發揮了殖民的效應，為都市中的分區帶來更新。透過觀察領土，我們可以知道社會安排如何進行。恐懼和空間是會相互影響的，這包含建築、城市規劃，以及「標籤化」威脅和暴力，並將其定位為次級群體。我們可以在有城牆的城市、封閉社區或軍事化城市中看到這種空間效應。只有與殖民地對比，都市與其他空間之間的差異才會被看見，都市也才因此而是「都市」。正因如此，我們應該重視恐懼地理學的概念，將都市化的過程，理解成因為種族主義某種將危險「他者」視為罪犯的過程。

都市社會學學者曾以邊緣國家為研究對象，並指出特定勢力會透過媒體和日常對話強化不安全感，或誇大犯罪的實際情況。在軍事化都市規劃美學的主導下，都市中的圍欄和牆壁變得更密集，這不只是為了安全或隔離，也考量了美學和階層。由此可見，恐懼政治這套媒介，發揮了維繫、加深社會不平等與都市暴力的作用，並很大程度地鞏固了社會分裂。

另一個關鍵錨點，是恐懼政治用以詮釋善（我們）惡（他們）的、柏拉圖式的思想基礎，這與道德、宗教信仰和理性之間的關係息息相關。上述這些因素共同作用於宗教、國家與理性，不僅形塑著社會規範與制度，也引發了集體的反應與共感。「文明」和「馴化」過去經常被以較為正面的意義使用，然而如今婦女、被殖民者、受奴役的人（也就是「異類」），仍然更容易成為父權體制的直接目標。也難怪極右派的行動會被視為具有男性化、白人化、宣揚異性戀男子氣概與軍事暴力的傾向，這也反映在他們對所謂的「性別意識形態」的排斥上。婦女從被侷限在家庭裡面，轉變為佔據公共空間，確實在男性內心激起了某種存在主義的恐懼。

### > 威權主義的想像與社會趨勢

除此之外，個人化、數位化、緊迫感這三個當代獨有的社會趨勢，也成為了威權想像崛起的社會存在錨點。個人化指的，是現代個體的生活，很大程度是由對於陌生者的恐懼而驅動。如今，個體生活於一個令人不安的世界，於是需要透過各種方式，來避免自己被視為危險他者。換句話說，社會連結被經濟結構層面的恐懼所支配了，而國家則作為威權，確保社會生活的穩固。「自我企業家精神」便是這項社會趨勢最為極端的表現。

數位化的趨勢，則是關於影像的影響力，如何於時間加速的現實中不斷增強。這個趨勢不只使得資訊得以大量流動；也促進了科技進步、連帶影響了人們的互動方式與社會關係；更使得人們的注意力破碎化，限制了人在短時間內接收不同可能性的能力，並進一步地增強了影像於短短一瞬間能發揮的力量。同時，這些效應，也反過來協助了數位化這個趨勢的存續。影像具有「象徵功效 (symbolic efficacy)」，意即帶有內容，且能快速地在個人的意識中產生意義。影像的這些特質，與社會的數位化有極大的關係，而這對語言以及思想的傳播，都帶來了顯著影響。藉由散播一系列宣揚威權主義、種族主義、男性主義的影像，極右派得以擴張自身對於世界與社會的想像。

最後，在當代資本主義中，我們處於技術發展與時間加速成反比的矛盾中，這導致了持續的時間緊迫感，因為時間不夠。儘管交通、通訊，特別是生產速度的提高表現出一種豐富的時間經濟，但這一切卻走向了時間的枯竭。現代性的加速意味著社會的不同步，個人總是感到自己遲到了，害怕錯過機會。這種延遲感促進了極右派的兩種戰略，第一是一切都是「最後通牒」：「我們必須採取行動，現在就必須行動」，沒有時間去制定未來計劃。第二則表明了機構及其設備的陳舊，這些機構在面對迅速流動的需求時表現緩慢。這些維度源於 Helmut Rosa 所反映的時間加速動態，影響了集體和個人對時空的理解。如果在社會結構的作用下，儘管個人願望是相反的，但是時間緊迫感被強加，那麼我們可以說這其中包含了代理的手段。

## > 小結

恐懼貫穿了歷史，形塑了人的主體性、持續地影響著語言結構，並改變了人際關係。恐懼的政策則被利用於合理化人際／團體之間／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威權實踐。恐懼蔓延於社會的多個層面，其帶來的各種影響相互維繫著彼此的存續。應用恐懼的方式越來越多元，這樣的政治效應，使得統治者意識到自身有更多支配、控制社會的手段，並擁有了操弄人們的主觀認知與互動方式的能力。■

來信寄至：

Lara Gonçalves Sartorio

<[larasartorio@iesp.uerj.br](mailto:larasartorio@iesp.uerj.br)>

# > 以水資源運動抵抗 新自由資本主義

Madelaine Moore, Bielefeld University, 德國



瓦拉甘巴大壩。來源：iStock, zetter, 2022。

**小**時候我生活在澳洲，那是在2000年左右。我非常清楚地記得，當時整個澳洲正處於早期，水資源缺乏的狀況相當嚴重。爾後我雖然移居北歐，但過去十年裡北歐地區多了許多地下水減少、乾旱和河流枯竭等狀況；當地居民討論如何應對問題和對於狀況憂心的程度，也變得越來越頻繁。這樣的情況，引起了我埋藏記憶多年卻相當清晰的，面對澳洲乾旱問題的擔憂。在一些多為少數族群生活的區域，水資源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人相當奇怪，只有面對水資源變得匱乏、河川不再流淌，又或者水受到嚴重污染而危害健康時，我們才會開始意識到水資源的重要性。並且，我們也才恍然大悟，原來水資源在全球政治經濟中佔了相當重要的調節作用。水資源的存在與缺席，不僅決定了我們的生活方式與居住地點，也決定了誰能夠在這個世界生存下去。

## > 發展以共同利益為核心的解決方案

人們與水的疏離、異化現象，並不是非常普遍的狀況。事實上，許多原住民社區將水視為生命的一部分；水，在他們的世界觀中是不能被商品化的。然而，對於那些無法取得乾淨飲用水的 20 多億人口，以及生活在缺水環境的全球 25% 人口來說，水卻不是如此理所當然的資源了。由此，全球關注水資源議題的

社會運動者正以「水即生命」的口號呼籲民眾團結一致——我們應該將水資源視為一種共同利益，這件事正是成功應對當前生態危機的核心關懷。

我們目前正面臨全球水資源危機，水資源及其相關服務，以及水資源相關的基礎設施卻持續被商品化、私有化、商業化，甚至日益趨向金融化。奇怪的是，上述情況竟被視為解除水資源危機的手段，而非造成問題惡化的根本原因。舉例來說，最近召開的聯合國水資源大會，這是 50 多年來首次專門討論水資源問題的聯合國會議。而其會議成果包括呼籲進一步動員私人企業填補資金缺口、鼓勵跨國、水務公司和金融機構做出自願承諾，並參與討論如何將水資源管理與綠色金融（如今或許包括藍色金融）和企業社會責任更加緊密地結合起來。然而遺憾的是，許多專注在水資源議題的社會運動者和非政府組織皆未受邀參與此會議。

## > 謀生與謀利的拉扯：對水資源商品化的抵抗

我近期出版的書《[Water Struggles as Resistance to Neoliberal Capitalism: A Time of Reproductive Unrest](#)》，討論全球水資源危機以及澳洲和愛爾蘭的社區如何抵制水資源被商品化的擴張。我採用一種綜合比較的研究方法，將與水資源相關的鬥爭視為一種載體，透過這個載體使特定時刻具有連貫性；其特徵是經濟、生態和社會再生產危機的並存，全球水資源危機則是其中的一個面向。

本書有兩個核心重點：首先，我說明剝奪（水、自然和社會再生產）的行為在資本積累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其次，我指出那些為了因應上述動態而出現的代理形式。除此之外，書中我也透過與愛爾蘭對水費的抗議，以及澳洲抵制非常規天然氣擴張的活動進行對話，並探討生命與利潤創造之間緊張的張力。也就是這兩者間的緊張關係，決定了新的水商品領域。

我主要的論點是：每種對於水資源的剝奪行為，皆反映系統內不同卻具相關性的面向，然而這整個系統卻是在削弱人們謀生與展現生命力的能力。這

>>

兩個案例中，水資源無論是作為社會再生產基礎設施的一部分，抑或被用於其他建設，其都被重新構想成為資本積累的用途——水資源成為應對 2008 - 2010 年金融危機後的挑戰。在澳洲，自然經常被比喻為「水龍頭和水槽」，亦即，經濟成長依賴對自然的持續剝削、徵用。不幸地是，剝削狀況不只發生在水資源，化石燃料、採礦和農業等其他資源一樣深受其害。與此同時，愛爾蘭的公共供水服務也成為重新平衡公共預算的手段，以用來彌補銀行紓困後工人階級社區所遭受的負面影響。

### > 「球形修復」是無效的危機管理方法

本書的一個關鍵論點：透過將水資源作為資本積累手段，並無法解決潛在的經濟危機。相反地，不斷地剝削、徵用自然資源，以及對於如何運用水資源的重新預想反而被轉移成為使資本積累成為可能的條件，如：社會再生產、自然，以及數量增多的國家。由此，我借鑒 David Harvey 的「空間修復」(spatial fix) 概念，透過社會再生產理論對於目前水資源議題所面臨的困境進行解讀。我提出球形修復(spherical fix) 的概念，說明危機如何因政府的處理方式，不僅未被解決，反而被轉移至社會中其他的弱勢領域。例如：愛爾蘭的經濟危機看似得到「解決」，但是實際上卻使工人階級社區發生再生產危機；澳洲潛在的經濟危機狀況也看似被避免，然而經過政府加強開採化石燃料，將其用於出口後，卻加劇生態危機，並耗盡依賴水景資源的農村之社會再生產力。這種球形修復的觀點，凸顯了資本積累制度是大量仰賴對自然資源的剝奪和社會再生產勞動的；因此，這即是解決當代全球水資源危機的關鍵。

然而，在每個案例中，只求資本積累的政治機構都必定走向不穩定或衰落。例如，那些將跨國資本的再生產，視為比農村和工人階級社區更優先事項的國家。因為政治與經濟利益的公開重疊，既導致了替代性的正式政治機會的減少，也致使那些在現狀中被視為可有可無的人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更進一步地說，經濟危機如今也以政治危機的形式出現。鬥爭過程中，出現了與以往情況不同的具顛覆性的理性經濟；舊有的政治版圖，更隨著社區中新政治化的方式被重新配置。

### > 社會鬥爭和階級對立日趨嚴重的兩個例子

澳洲的農村社區，他們正為了抵抗社會與自然的異化努力奮鬥著。藉由將水資源重新定義為集體財產而非私有財產，這件是說明了原先的異化其實是澳洲白人透過商品化水資源來殖民擴張的延伸。此外，將水和社區理解為共同組成要素，就必須將土地所有權問題與私有財產問題分開討論；因此，在此我們提出了原住戶土地被剝奪的問題，以及政府問題化無地主的土地這項問題。而這些社會運動中，出現了不同的以國家與以市場為主導的邏輯現象，也出現了以生態為基礎的階級對立情況。水資源被理解為一種有爭議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階級更被這些剝奪的過程所決定。

在愛爾蘭，對於社會再生產基礎設施的水資源之討論，迅速演變為對其國家和相關機構(尤其是代議制民主制)的批判。水資源應該被視為社會再生產和相關基礎設施的一部分，被理解為共同的、集體的權利；水資源不應成為使資本積累的目標。然而，這些主張凸顯了國家對這項集體權利有限的責任能力：國家的物質限制意味著，即使水資源的權利在文書紙張上得到了進展，但在實際層面政府卻也無法實現。愛爾蘭及水資源問題被嵌入全球金融資本的循環中，即表明了它將繼續成為實現工人階級利益的阻礙。

### > 顛覆性的經濟理性空間：再生產的動盪

社會抗爭的過程不只會出現暫時的結盟，同受到剝奪之苦的關係使社區之間和社區內部的團結得以可能。此外，愛爾蘭和澳洲的社區都體現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主要矛盾：謀利和謀生的條件，日益不相容。透過與生態社會主義和社會再生產理論的對話來分析這些抗爭，我們會發現，階級抗爭的舞台擴大到了家庭、自然和鄰裡之中。

將這些抗爭置於全球水危機之中，並從矛盾點出發，我認為關於水資源的抗爭既打斷了資本主義再生產的進程，又為顛覆性的經濟理性開闢了空間。在澳洲和愛爾蘭，出現了一個再生產的動盪的時代。也正如我書中所展示的，全球水資源危機不僅涉及資源的取得或管理，更甚，問題的關鍵在於允許掠奪水資源和危機發生的社會關係和制度。■

來信寄至：

Madelaine Moore

<[madelaine.moore@uni-bielefeld.de](mailto:madelaine.moore@uni-bielefeld.de)>



